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0 期（民國 87 年 12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抗戰前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1929-1938

蘇 雲 峰

## 摘 要

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介紹政黨滲透清華的經過。由於清華地處郊區，又有傳統學術自由的保障，故易為共黨所滲透。這就是清華能從五四時期之後知後覺，轉變為一九三〇年代之先知先覺，成為全國學生運動領袖的原因。

第二節談清華與九一八救亡運動，由於這時尚無顯明的政黨介入，可以說是一次純正的愛國運動。但在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下，清華地下黨又活躍起來，為下一波運動作好準備。

第三節介紹 1935 年底之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及其後一年之相關活動。因其影響遍及全國，為中共之取得政權奠立根基，受到今日大陸各大學校史編者的高度評價。但本人研究發現，這一運動因受到清華中共地下黨份子的影響，行動偏激，以救國之美名，行挽救逃竄中共黨之實，為國民政府增添極大的麻煩。

第四節從外鬥到內鬥，陳述清華校園內部不斷發生左派學生和教授的衝突，以及學生之間的左右派衝突，嚴重破壞校園安定發展的情形。

第五節從櫬棺遊行至西安事變，除說明學生行為粗魯，思想左傾冒進外，亦指出張學良支持一二九運動，以達到逼蔣抗日，挽救中共之危的目的。

最後為結論，對學生運動尤其是一二九運動重新評價。本人認為學生運動是時代的病態，學生之政治性運動多為在野政黨所煽惑利用，及其一旦取得政權，必然轉過頭來壓制學生運動，故學生始終是輸家，不值得鼓勵。至

於一二九運動，本人認爲它名義上救國，實質上則是誤國的。

**關鍵詞：**一二九運動　中共地下黨　梅貽琦　教授會　救國會　護校團　西安事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0 期（民國 87 年 12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ent Movements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29-1938

Su Yun-feng

##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sections in this paper. Sect. 1 describes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re able to infiltrate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Communists' infiltration revolutionized th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movement outside campuses. This was the main cause that made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ents leaders of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nation.

Sect. 2 shows that the involve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September Eighteenth Anti-Japanese Aggression demonstration which occurred throughout China in 1931. Though these student parades were basically patriotic in nature, they escalated the feeling of nationalism to such a degree of no return that the Communist infiltrators were provided with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versities.

Sect. 3 shows that it was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leftwing students who, in order to rescue the Communists from being eliminated, took the initiative to organize students in Peking to demonstrate on December the Ninth of 1935, and t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In so doing, the students push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to a dilemma.

Sect. 4 describes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and those between the leftwing and rightwing students. These political struggles caused turmoil o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campus.

Sect. 5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rushed into extremes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fight immediately against the Japanese, which led to the Sian Incident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This War g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nd to become strong enough to overthrow the KMT Government. In my final analysis, the December Ninth Student Movement was patriotic in name only. It was harmful to the nation in reality.

**Key words:** December Ninth student movement, underground communists, Mei I-ch'i(Y. C. Mei), Chiu-kuo-hui, Hu-hsiao-t'uan, Sian Incident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0 期（民國 87 年 12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抗戰前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1929-1938

蘇　雲　峰[*]

前　言
一、國共兩黨滲透清華的經過
二、清華與九一八救亡運動
三、清華與一二九運動
四、從外鬥到校園內鬥
五、從抬棺遊行至西安事變
結　論

## 前　言

從世界史的觀點，學生運動和當權的政府經常是一個矛盾的對抗體。所有的政府都不喜歡學生運動，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疏導、安撫解決，最後一定採取鎮壓手段，迫使學生就範，或被學生運動所推翻。學生運動有理性自發的，但很多是受到校外政黨煽動而發生的。理性往往被激情所湮沒。最弔詭的是，所有在野政黨多傾向利用學生熱情，發動學潮，顛覆政府，一旦取得政權，則轉過頭來鎮壓學運。所以抱著純淨的心去參加學生運動者，永遠是輸家。

學生運動的原因很多，就民國成立以後而言，重要因素有五：一、國家分裂，政治鬥爭不停，學界植黨營私，不受法律管制，使學生不安於學。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自二十一條、山東問題和九一八，激化學生的民族主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義情緒。三、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解放了學生的思想。四、國共兩黨介入校園，引發校園內外的政治鬥爭。其中尤以蔡元培早期在北大的領導風格，和李大釗、陳獨秀、魯迅[1] 等人的鼓吹最為關鍵。他們把大學的使命擴大到教學研究的範圍以外，干涉政治，顛覆政府，固然發生了作用，但也反過來鬆動了大學的根基。連蔡氏自己也為區區講義費，被學生「威迫狂號」，憤而和教授群一起辭職。[2] 其後之各大學校長無不身受其害。

北大講義費風潮之後，蔡元培開始反省， 1927 年起，不贊同學生借愛國之名罷課遊行。[3] 北伐後更要求學生專心讀書，勿干政治，否則教育和學術破產，國本動搖。但是學生的思想一經解放和激化後，難以冷卻，加以日本的侵略和共黨的煽動，導致高等教育的動盪不安。理性在這一時期已被視為保守和反動。

清華本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經費充裕，設備精良，初期對學生的管束甚嚴，又有美國的關注（可以說是干涉和保護），五四以前，雖有些越軌行為如趕校長等，尚不礙大局。五四後清華也深受衝擊，於是成立「學生會」，要求學校改革，三度趕走校長，並參加北京八大專學校的索薪遊行。北伐期間，學生政治態度雖傾向南方，反對北洋，但基本上以校內改革為主軸。

北伐後羅家倫出主清華，國民黨勢力進入校園，左派受到抑制。 1931 年之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反日情緒高漲，清華共黨組織又活躍起來，隨著就發生一連串的請願遊行。其中，最著者為九一八後的「救亡運動」和一二九及

---

1 李大釗和陳獨秀都在北大任職，他倆的思想立場詳見陳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1923 年李在北大學生聯合會講〈紀念五月四日〉，云：這是學生加入政治運動，整頓政風的日子。因政治不清，所以學生才犧牲求學，干涉政治。現革命未成，學生應「繼續革命」。現應作二事：一組織民眾，成為「大革命的工具」，二對現政府應立於彈劾的地位。他要學生努力去作，才有大效果。《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年），頁 463 ，原登於晨報。至魯迅則自 1920 年 9 月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 1923 年 9 月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任教，直到 1926 年 8 月被迫南下為止。在這六年中他對二校之學潮都扮演推波助浪的角色。

2 〈北大講義費風潮〉，民國 11 年 10 月 18 日，孫常煒，《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新店：國史館，民國 75 年），中冊，頁 669-671 。

3 蔡元培，〈讀書與救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卷 5 ，頁 122-124 。

其後之一連串抗日請願運動。我們發現學生在一二九運動中及其後叫出的口號，大體上和中共的抗日策略一致。不過前一階段，比較理性溫和。而後一階段，則每多蠻橫粗暴，爲首者居然爲清華和燕京二校。本文就以清華爲軸心，探明一九三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性質，及其對北平政局、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的影響。惟重點在清華校園，這是和其他一二九運動研究偏重街頭示威活動不同之處。

本文分爲五節，由於三十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與國共兩黨有密切的關係，故第一節介紹政黨滲透清華的經過。第二節談清華與九一八愛國運動，第三節介紹一二九運動，這是大陸各大學校史認爲最重要的一次學生運動，是學生從「反動」到「革命」的轉捩點。本節強調學生受中共地下黨份子滲透行動偏激的情形。第四節從外鬥到內鬥，看學生運動破壞校園安定的情形。第五節從檯棺遊行、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看中共地下黨份子如何操縱學生運動。最後爲結論，對學生運動尤其是一二九運動重新評價。

本文所用資料，以《天津大公報》爲主，其他資料爲輔。何以如此？原因是國民黨對平津新聞媒體實行嚴密控制。《天津大公報》立場公正客觀，也是刊登學運消息最爲翔實的報紙。[4]

## 一、國共兩黨滲透清華的經過

在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後，國、共兩黨都爭取學生「爲我黨所用」。[5] 兩黨在北伐期間之學運所造成的政治社會亂象，和對教育界的嚴重破壞，已爲人所共知。北伐以後，取得政權的國民黨反過來限制學生運動。1928年8月，蔡元培根據中山大學和兩廣教育廳的建議，於國民黨第二屆五中全會中，提案限制學生運動。他說過去國民黨發動學運，乃基於犧牲部分青年利益，求

---

[4] 胡適，〈爲學生運動進一言〉，《天津大公報》，民國24年12月15日。又《天津大公報》，民國24年12月14日，〈希望學生復課〉的社論，亦指出學潮原因之一是政府「檢査新聞，封鎖消息，箝制言論」，使學生祇有從外國報紙中找到不完全的消息，因而「鬱結生恨」。

[5]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3年），頁247-417。

得政治上多數人之最大幸福，是不得已的決定。北伐期間，學生有鼓民氣之功，也有犧牲學行之弊，「惟今思之，實有歉疚」。因未成年男女，身心發育未全，知識經驗不足，極易爲少數「學生政客」所利用，名爲民主，實乃專制愚民，若不改革，教育勢必破產。爲保護青年，他主張今後應停止學運。有人問國民黨不搞學運，其他政黨從事學運，何以對付？蔡元培說，國民黨已控制學校人事，教職員中已有黨組織，足可監視異黨活動而阻止之。[6] 學校能否阻止異黨活動的確是一個問題，不過，蔡氏之建議足以顯示國民黨取得政權後一反過去的態度。中共尚未取得政權，自然得繼續努力。

關於中共的學運口號，1924 年國民黨改組後至 1927 年清黨分共前，中共學運口號與國民黨一致：「反帝、反封建」。及 1931 年夏實施「圍勦」，中共之當然反對國民黨。九一八後中共是「反蔣抗日」和「保衛蘇維埃」。1935 年 12 月瓦窯堡會議接受第三國際的「抗日統一戰線」方針後，改採兩面策略，在廣西反蔣，在華北、華東和西安等處，則爲「逼蔣抗日」。西安事變，達到「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的目的，但七七事變後則「抗而不戰」。目的在壯大自己，坐收漁翁之利。[7] 中共視學生運動爲奪取政權的重要手段。爲爭取學生，特別鼓吹愛國主義，支持學生爭取言論結社自由、民主和學術獨立。但不鼓勵學生「鑽入書本」，而是去罷課遊行，反對政府。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所以要談此一時期的清華學生運動，就必先了解共黨滲透清華的事實。

## （一）北伐前的清華左派

中國近代高等學校大多集中於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國共兩黨爲爭取學生，都在城市設立黨組織，領導學運。有人說，劉少奇於 1936 年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後，「才是中共與平津學生運動積極結合的開始」。[8] 實則，

---

[6] 蔡元培，〈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卷 5，頁 264-268。

[7] 陳存恭，〈毛澤東抗日策略：由「不打硬戰」到「抗而不戰」〉，《中華軍史學會會刊》（台北：中華軍事史學會），期 3（民國 86 年 12 月），頁 77-115。但學生的行動有時超越中共中央的指導原則。

[8] 謝國興評，〈李義彬主編：從內戰到抗戰，1935-1937〉，國史館編，《中國現代史書

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李大釗已在北大設立組織，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都有學生參加他們的活動。[9] 共產黨於 1921 年 7 月成立後，設立「北京地方委員會」和大學黨支部等組織，從事學生運動。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是這時候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因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名校都在北京西郊， 1923 年底，中共設北京西部區（後稱西郊）黨部，以陳毅爲「西部區中法大學黨支部書記」，其他支部未詳。 1926 年北京市委書記爲陳爲人。北京西郊部委下轄：燕京、清華和香山慈幼院三個支部。清華黨支部早期的主要工作是：一、發展黨員。二、從事國民運動，與國民黨合作，發展群眾。三、領導學員學習革命理論。此類活動，直到 1927 年 4 月李大釗等二十人被張作霖捕殺後，暫時停止。[10] 劉少奇主持北方局以前，清華等校地下黨已有自主性的活動，一二九運動就是他們的傑作。惟由於左傾冒進，被劉少奇糾正。這一點將在下面論述。

清華學生思想左傾發生於五四， 1924 年國民黨之改組後益加激化。此年清華畢業之施滉（ 1926 年史丹福大學政治學士）、徐永煐（江西龍南人， 1927 年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士）、冀朝鼎（山西汾陽人， 1928 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等人和李大釗早有接觸，思想左傾。施等組織「唯真學會」(1920)和「超桃」八人秘密組織(1923)，同情勞動階級，提出反帝、救國口號，支持國民革命。施滉、徐永煐和何永吉（廣東番禺人， 1924 級，留美讀威斯康辛州 Beloit College 一年得歷史學士學位）三人，曾於 1924 年 1 月親赴廣州訪問孫中山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回來後將訪問紀錄登於《清華周刊》。[11] 此年底孫中山應段祺瑞臨時執政之邀，北上共商國是，清華學生

評選輯》（新店：國史館，民國 86 年），頁 110-111 。

9 北京師範大學校史編寫組，《北京師範大學校史， 1902-1982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2 ），頁 53 ， 75-77 。中共最早在北京女高師的黨員是女生繆伯英（ ? -1929 ），她於 1920 年初就參加李大釗的「北京工讀互助團」，到北大去聽李大釗和陳獨秀的課，與鄧中夏等研究讀《共產黨宣言》和馬列著作，受李大釗指示散布馬列書刊給女高師同學手中，及中共成立，成爲黨員，積極活動。

10 《陳毅傳》（北京：中國當代出版社， 1991 年），頁 632-635 。時陳毅二十二歲，從留法勤工儉學回來才一年，已正式加入共產黨，爲北京中法大學文學院的學生。

11 何永吉，〈見孫中山先生記〉，《清華周刊》，期 308 ，民國 13 年 4 月 4 日，頁 23-44 。在這次訪問中，三人問了許多有關革命接班人、自由與紀律、是否仿效俄國主義、軍紀

也晉見孫中山，表示支持革命。及孫氏去世，清華人同感悲痛。 1926 年 3 月 13 日，清華學生會舉行孫先生逝世週年紀念，請李大釗和陳毅兩人演講。李大釗講〈孫中山在中國民族革命歷史上之位置〉，強調其改組容共的意義和成績。陳毅則不否定「國民黨赤化」，並詮釋所謂「共產」，「乃在使天下之人，共天下之產，同享幸福」。時屆五點，「在座者大多早已紛紛離席」。[12] 但經過李、陳兩人的鼓吹，「共產主義思想開始在進步的學生中得到傳播」。

適 1926 年英美日等國藉口「大沽口事件」，要求中國懲凶賠償。北京學生 3 月 18 日遊行，就以反帝國主義為口號。清華學生也參加遊行，不過在隊伍後頭。結果被軍警鎮壓，槍傷學生二百多人（其中清華二十多人），死亡四十七人，這就是「三一八慘案」。值得注意者，在死亡名單中，有清華之韋杰三一人。他立即成為清華學生運動的「烈士」。[13]

清華中共黨支部成立於 1926 年底，創立者為王達成。王係燕京大學畢業，共產黨員，此年 11 月來清華圖書館任職。時清華學生中僅有兩位黨員：雷從敏（ 1928 級，後入康乃爾大學學工程），和朱莽（ 1931 級，歷史系）。經過北京市委書記陳為人的介紹，王和雷、朱二人認識。他們三人於是開會，成立清華第一個黨支部，以王為支部書記。數月後黨員增為七人。[14] 另外，1927 年 2 月，梁啟超說清華國學研究院中有共產黨二人，國民黨七、八人。[15] 國

和治安、由南統北是否較難、人生觀和對美國教育與留美學生的評價等問題。孫中山回答如流。三人一致肯定孫是個偉大人物，樂觀進取，做事只問對錯，不問成敗利害。另據孫敦恆，〈施滉， 1900-1934 〉，《清華英烈傳》（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5 ），頁 7-18 ，由施滉所領導的「超桃」成員七人，留美後均於 1927 年加入共產黨。表示他們在校時尚未入黨。

12 〈中山先生週年紀念〉，《清華周刊》，期 371（民國 15 年 3 月 19 日），頁 231-233 。

13 韋杰三是廣西蒙山人， 1903 年生， 1925 年才考入清華大學部一年級，他思想左傾不是偶然的。 1921 年就讀東南大學附中時，任學生自治會周刊主編，評論校政，被迫轉入中國公學，二年後又休學，返廣西蒙山老家當教員，和校長等人開書店，出售《嚮導》、《新青年》等刊物。 1924 年讀左派創辦的上海大學英文系，參加五卅抗議日本殺害工人運動，思想更激進。孫敦恒，〈韋杰三， 1903-1926 〉，《清華英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4 年），頁 1-6 。

14 如前引孫敦恆，〈王達成〉，《清華人物志》，冊 3 ，頁 210 。新增者可能就是朱治理、朱器、馮仲雲等四人。

15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民國 47 年），頁 725 。

共兩黨勢力相當，不過共黨旋被張作霖抑制。跟著翌年底國民黨的勢力隨羅家倫進入清華，共黨轉入地下。[16] 總之，在北洋時代，國共兩黨已滲透清華，共產黨且建立了清華支部組織，惟受到以讀書放洋校風的影響，人數極少。北伐後國民黨雖已掌控清華，但共黨仍續有地下活動，九一八以後又活躍起來。

## （二）北伐後的清華共黨組織

中共在江西井岡山被圍剿期間，爲了減輕壓力，地下黨發動學生運動，分化國民黨的力量。中共在北方的組織，最高者爲天津的「北方局」，其下爲河北省委（書記高文華），和北平市委會。在一二九運動以後，始與平津學生運動關係較密切者爲「北方局」和北平市委會。因這兩個組織於 1934 年 8 月被破，北平市委會翌年底才恢復。清華中共黨支部，也於 1935 前半年的兩次大搜捕而被破壞，此年 8 月才告恢復，蔣南翔爲委員兼共青團書記。劉少奇則於 1936 年春到天津恢復北方局，翌年 3 月移駐北平。[17] 北平市委會被破後，由團市委代理，至學生運動則由其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和北平學生聯合會（1935 年 11 月成立）負責。[18] 這兩個組織的主要成員，多爲清華學生，如蔣南翔、[19] 姚依林、黃誠、吳承明、[20] 李選青等。

---

16 《清華大學校史稿》，頁 77-92。中共清華黨支部第一任書記爲王達成（1926 年 11 月至 1927 年 4 月），第二任爲朱器（1927 年 4 至 7 月），第三任爲朱理治，第四任爲馮仲雲。朱理治於 1926 年考入清華，翌年四月加入共產黨，7 月任中共清華支部書記。於李大釗被捕後，與黨組織保持聯絡，保護清華同黨，被通緝逃滬，並未畢業。後歷任中共黨務要職，1978 年去世。馮仲雲也 1930 級，未畢業，抗日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三路政委，1950 後任中共水電部副部長，1963 年去世。

17 天津北方局設於何年並不清楚，惟與劉少奇有關。劉於 1928 年春到天津指導北方革命運動。1929 年 2 月到北平了解地下黨工作。然後回天津，調上海，在天津和北平居留的時間很短，但與設立此兩個組織有關。劉於 1936 年春才正式到天津擔任北方局書記，四月寫〈關於白區職工運動工作的提綱〉。見《劉少奇同志生平活動年表》（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1980 年），頁 5-9。但《清華大學校史稿》誤植劉少奇任北方局書記於 1935 年，說一二九運動是劉少奇領導的。

18 時北平學聯主要成員爲：主席郭明秋（女一中）、秘書長姚依林（清華）、總交通孫敬文（鏡湖中學）、總糾察鄒魯風（東北大學）等人，學聯機關設在女一中。《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1919-1949》（北京：北大歷史系，1979 年），頁 125。

19 蔣南翔(1913-1988)，1932 年考入清華中文系，參加左派社團，1933 年 10 月經歷史系

何以清華後來轉居學運龍頭？一因地處郊區，二因有學術自由傳統的保障，較易滲透。如前所述於 1926 年 11 月建立了清華黨支部，先後任支部書記者有王達成、朱器、朱理治、馮仲雲等人。北伐後受到抑制轉入地下，1930 年初由共青團團員翟鳳陽（未畢業）組織「大地社」，有社員多人，夏堅白（1929 級，土木工程系）、葛春霖（1929 級，化學系）、葛和林（未畢業）等人。馮仲雲、陳志安（1932 級，社會學系）等多人曾參加北平革命遊行被捕，由校方出面保釋。[21] 此年底，羅家倫告訴陳布雷說：「北平共黨總機關，前在西郊燕京大學，自弟離平後已移到清華」，有黨員李景清（河南人，經濟系）、李兆瑞（河北人，政治系）和張欽益（河北人，經濟系）等人，都是 1931 級學生。再加上國家主義派的張人傑和劉大白（1930 級政治系），形成鬧事的一夥。[22] 羅之辭職和他們有關。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之第二日，清華學生便成立「抗日救國會」，1933 年又成立「讀書會」和「社會科學研究會」，10 月，歷史系萬愈之（未畢業）介紹同級中文系蔣南翔加入中國共產黨。蔣旋即成爲活躍的領導幹部，組織反政府不抵抗政策運動。1934 年後，校園左傾氣氛甚濃，尤以這一年入學的

萬愈之介紹入黨，1936 年 2 月 29 被捕獲救後，即離開學校，故未畢業。他曾任清華暑期學生會主席和《清華週刊》編輯，和姚依林等人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華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書桌〉是他的傑作。1952 年後出任清華大學校長，文革期間被鬥，勞改十年後復出主持國家科委和教育部等工作。《蔣南翔紀念文集》，〈蔣南翔生平年表〉，頁 427-430。

20 吳承明（1917-1998 以後），河北人，父畢業於北洋大學，業律師，母北洋女子師範畢業。吳承明 1934 年考入清華化學系，因搞運動，轉入經濟系，1936 年秋天和黃誠等三人被開除。七七事變後重入昆明西南聯大就讀經濟，1940 年畢業後供職重慶中央銀行，1943 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三年後得碩士學位。1947 年返國任上海中央信託局襄理，兼上海交通大學和東吳大學教授。1949 年後任職中央外資企業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機構。文革時下放幹校，到 1977 年轉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南開大學教授。1980 年日本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1986 年任加州理工學院客座教授。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之一。葉坦，〈吳承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 26（民國 87 年 9 月），頁 59-69。

21 蕭以何，〈沈痛悼念陳志安學長〉，《清華校友通訊》，復期 31（1995 年 4 月），頁 116。

22 〈羅家倫致陳布雷：對返回清大及繼任校長人選意見〉，民國 19 年 12 月 27 日，《羅家倫先生文存》（新店：國史館，民國 77 年），冊 7，頁 108-111。

新生爲最多，[23] 其中富家出身者不少。[24] 由於此年 8 月北平市委被破，地下黨組織只剩下黨員十人，其中清華學生四、五人，且都是主要骨幹。如姚依林、[25] 黃誠爲市委書記。[26] 1935 年 7 月，蔣南翔恢復清華黨支部，並任支部

---

23 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戰鬥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列》（北京：清華大學校史編研組， 1985 年），頁 100。姚說他入學後領導反對高年級生戲弄新生的拖屍(toss)運動，取得新生的好感和支持，故這一級同學如黃誠、楊學誠、吳承明等多人參加他的活動。下一註中何炳棣的回憶，也證明他的確如此。

24 據何炳棣回憶：清華女生毛梅（？）、孔富瑛（ 1939 級中文系）、魏蓁一（未畢業，後改名爲韋君宜，是著名的散文家，和 1936 級中文系之韋毓梅領導清華的「社聯」小組），都是我南開中學的同班。毛係富商之女，入學後不久即離校去革命。孔富瑛是山西的望族。魏家是大資本實業家，是天津英租界大洋樓的主人。這些人都是越富裕越有理想，越看不起錢財，要革命。一二九運動闖城門演說，大出風頭的陸璀（未畢業），是蘇州名娘，傳統式美人，愛上美男子球員闊少朱民聲（ 1934 級土木系），本想作闊少奶奶，因朱自費出洋學工程，行前不與陸結婚，陸一氣之下就革命了。又如張韻芝（ 1938 級物理系畢業，上海中西女校畢業，英文極好，一九五〇年代充周恩來秘書），家境很好，又甚西化，而就是要革命。何後來問張：難道當年用功讀書就不愛國了嗎？張承認她們當年見解太偏狹。

男生方面，如姚克廣（另名依林）的同屋郭惠成（ 1938 級經濟系）。家裡開永安公司，他與姚俱係上海光華附中畢業，姚全力從事革命。郭穿考究西裝，天天打哈氣，懶散得很，週末常進城大吃大用（有時在北京飯店過夜）。郭正作爲掩護姚的幌子或盾牌，而姚第一學期後很少在清華宿舍，多在城內。再如黃誠（ 1938 級歷史系），也出身上中地主之家。吳承明（二人均被開除），頭腦極清楚，後爲名經濟學家，其兄爲留學生，母爲大學畢業生，家境都是很好的。黃、吳 1932 年冬被北洋附中開除， 1933 年與何同住公寓，所以知道他們的底細。〈何炳棣致蘇雲峰〉， 1997 年 4 月 26 日。本函件所引內容不變，惟文字先後有些調整。

25 姚依林(1918-1994)說他原來讀化學系，因搞運動不念書，不作試驗，只好轉入歷史系（ 1938 級，但未畢業）， 1934 年寒假時就和蔣南翔加入「民族武裝自衛會」和「世界語學會」等左派組織， 1935 年 11 月入黨，奪取到北平各校學生會和北平學聯會等組織的領導權。如他利用暑假留校人數少時，取得清華學生會領導權，以劉毓珩爲主席。同時爭得《清華周刊》的主編權。操縱一二九運動及以後的一連串請願運動。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戰鬥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夕》（北京：清華大學校史編研組， 1985 年），頁 97-107 。

26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 1919-1949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79 年），頁 140-141 。黃誠 1934 年考入清華歷史系（非工學院）。黃於清華參加「東方既白社」，宣傳馬克斯主義，曾任清華學生自治會主席和清華救國會主席，被開除後任北平學聯會主席。戰時參加新四軍， 1941 年皖南事件被捕，遭顧祝同槍決。又據《清華大學校史稿》，頁 281-287 ，紀毓秀於一二九運動中，擔任糾察隊長，和清華民先隊隊長。

書記兼共青團書記。稍後有李昌（未畢業）、楊學誠、[27] 紀毓秀（女，1939 級外文系未畢業）、凌則之（社會學系未畢業）、于光遠[28]等人入黨。李昌且為民先隊清華大隊隊長。[29]

如上所述，清華改制後有一連串的內外運動，從九一八的救國運動，至一二九及其以後之抗日請願運動。前者純粹出於學生的愛國心，主動在學生，校外政黨的影響較少。一二九及其以後之運動，則顯然受到中共地下黨份子（非黨中央）的影響。其對校園外之輻射震撼，和對校園內之攪擾破壞作用，相當嚴重。

## 二、清華與九一八救亡運動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軍攻擊瀋陽（尤其北大營），翌日佔領瀋陽及長春，第四日佔領吉林。張學良不抵抗，[30] 國民政府向日本進行交涉，同時要求國際聯盟制止，由於美英等國縱容，日本乃視中國為囊中物。全國學生基於愛國熱忱，紛紛成立「抗日救國會」，鍛鍊自己，備為國用。示威遊行請求同胞抵制日貨，要求政府集中全國兵力，驅逐日本。

---

27 楊學誠(1915-1944)，湖北人，出身貧寒，1934 年考入清華物理系後，才關心政治，參加學運，是抬棺遊行主角。那副空棺是他抬到北大的。1936 年夏，由李昌介紹加入共產黨。先後任清華黨支部書記，參加北平學委的工作。七七事變前二、三月，曾到延安開會，見過劉少奇和毛澤東等人。七七後從天津到濟南轉湖北，任黨務重任。死於肺病。《清華英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143-154。

28 于光遠(1915-？)應為 1936 級物理系，但未畢業。參加一二九運動及民族先鋒隊。1937 年為中共長江局青委書記。後任延安《解放日報》副主編。1949 年後任中宣部處長、社科院學部委員、中科院副院長等要職。是當年參加學運有成的少數人之一。惟所任官職都與其所學物理無關。《清華人物志》，冊 4，頁 124。

29 民先隊和共青團都是國際共黨倡議的組織。少共國際於 1935 年 9 月決定改共青團為「抗日救國青年團」。翌年 2 月成立民先隊後就撤消北平共青團，以原來的團員為民先隊員。民先隊主要磨練軍事技術和生活。舉辦夏令營，讓學生過數日的軍隊生活，學習政治和共黨理論。到這年底，已在全國三十多個城市成立民先隊，有隊員三千餘人。其主要任務在爭取師生合作，支持學聯，串連學校，參加社團活動。《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183-193。

30 有人說是張學良奉命不抵抗。但據蔣永敬的研究，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和蔣中正都要求張學良抵抗，張不聽。蔣永敬，〈胡適與汪精衛〉，李又寧主編《胡適與國民黨》（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 年），頁 136-140。

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是珍惜學生愛國情操，極力輔導，以免為異黨所用。教育部於 9 月 23 日決定下列七項指導要點：一、對日本此次暴行及侵略政策加以研究和傳布。二、學生於課餘可組織宣傳隊出外演講。三、學生參加各種集會應由教職員負責領導。四、加緊軍事訓練和體育課程。五、學生應努力學業，不得罷課。六、學生應刻苦自勵，力戒浪漫逸樂。七、學生應遵守中央意旨及政府法規。[31] 時被第三次圍剿的中國共產黨，利用機會發表宣言，發動民眾反抗日本侵略，推翻國民黨政府，但並未發生作用。故這時之遊行，尚未以反對政府為目標，罷課為手段。南方較早又激烈，北方則較溫和理性。

全國學生救亡運動以上海為最早，不過，學生與各校領導人的言行，大多溫和理性。僅上海光華大學教授王造時（清華 1925 級，自由主義者，七君子之一）所領導的抗日救國會主張：停止內戰，取消專政，實行民主。[32] 及上海交通大學因不滿同學王恭琛（外交部王正廷之子）「日乘轎車出入酒館舞場」，將之驅逐出校而已。[33]

南京方面，9 月 28 日，有中央大學學生千餘人，赴中央黨部請願，遇見中常委丁惟汾和新任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請他們兩位率領到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請代表接見。學生不滿，上樓搗毀客廳，毆打部長，撕破其衣服。王頭腰受傷出血，不省人事。職員也有受傷者。事後學生又轉赴國民政府請願。[34] 中央大學是國民黨比較關愛的學校，學生行動如此鹵莽，實令國民黨中央震驚。

---

[31] 見《大公報》，民國 20 年 9 月 29 日。以上均轉引自《教育雜誌》，卷 23，期 11（民國 20 年 11 月），頁 107-113。見《申報》，民國 20 年 9 月 25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9 月 28 日的「告全國學生書」，指示學生愛國運動之方針及組織，除了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外，其基本精神和上述七項指示相同。

[32] 姜平，〈胡適與王造時〉，李又寧主編，《胡適與民主人士》（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 年），頁 296-305。

[33] 自 9 月 22 日至 30 為止，上海教育界、高中以上學校學生和各大學校長，分別成立抗日救國會、抗日救國聯合會、和全國抗日救國總會等組織。學生的要求不外男生受軍訓，女生受護理訓練，抵制日貨，研究日本，並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各大學校長的決議，也遵循教育部的七項指導要點，支持學生行動，但呼籲「救國不忘讀書」。《申報》，民國 20 年 10 月 1 日，轉引自〈國內外教育界之抗日救國運動〉《教育雜誌》，卷 23，期 11（民國 20 年 11 月），頁 107-108。

[34]《時報》，民國 20 年 9 月 29 日，轉引自同上《教育雜誌》，頁 108-109。

杭州高中生八百餘人，9月26日到教育廳請願，要求中央對日宣戰。時外交部長王正廷和交通部長王伯群，在杭購置別墅，陪夫人遊湖，爲社會輿論所不滿。學生憤而搗毀二人別墅之日製磁器和玻璃，並要求中央「撤職嚴懲」。[35]

廣州方面較爲偏激，學生於10月10日愛國遊行時，有人發現公安局永漢分局長杜煊泰所經營商店販賣日貨，憤而檢出焚毀。杜某令警察開槍，擊斃民眾二十餘人，傷三、四十人，拘捕百餘人。在死亡者中，有中山大學學生三人和他校學生二人。翌日有學生五、六千人請願槍決杜某，和省公安局長陳慶雲兩人。國民黨要員汪精衛、孫科、蕭佛成、陳濟棠等接見學生，答應准陳某辭職，並成立特別法庭進行審判杜某。學生堅持立即槍斃。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疑「有共黨參加」，[36] 廣州市政府乃下令撤銷各界抗日會，通令各校復課，規定「以後一切民眾運動，須得市黨部令，方准舉行。」[37] 事件暫告平息。但以清華爲中心的北方救國運動則如星火燎原一般蔓延開來。

### （一）以清華爲軸心的北方救國運動

平津一帶的抗日救國運動比較溫和。先是9月26日，天津南開中學生成立「刻苦團」，要求在生活上力求儉約，刻苦自勵，鍛鍊身體，每兩週露營一次，努力功課，不買日貨，注意時局。[38] 翌日平津學術團體在北平師範大學集會，作成十一點決議，其中重要者要求各校據教育部上述七項要點輔導學生，堅忍沉著，團結一致，勿自起糾紛，亦勿採過激行動，刺激日本。[39]

清華學生會於9月20日就成立了「抗日救國會」（後簡稱「救國會」），

---

35 《時事新報》，民國20年10月1日，轉引自同上《教育雜誌》，頁110。

36 許崇清的懷疑是有根據的，因第三任校長朱家驊說，清黨後，中山大學的教職員、學生和工人，參加共產黨的「竟多達五百人，佔全校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在大學本預科學生將近三分之一。」他們要「打倒知識階級」，說「讀書便是反革命」，天天鬧事。雖經朱氏四年清理，恐未必能乾淨。黃福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7年），頁89-90。

37 根據《時報》和《時事新報》事發後各日電訊，轉引自 同上《教育雜誌》，頁110-111。

38 《天津大公報》，民國20年9月28日。

39 《民國日報》，民國20年10月1日。

但以空談狂叫無補於事，乃於28日未經學校同意，以全體大會三分之二議決：全校軍營化，暫停課三周接受軍事訓練。軍營化之生活程序，規定全校男女同學一律每日六時起床，六時半早操一小時，八至十時男生接受軍事訓練。午後一至三時男生軍事演講，三至五時軍事操（女生救護講習），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公開演講，十時休息。在飲食方面，力求刻苦節省，不得零食。軍事教官除清華軍事訓練部三人外，另聘北平陸軍大學三人爲教練。三星期後再補習停課期間的功課。[40] 學生還出版《鐵血周刊》，專載日本對滿蒙問題，供全國學生及同胞閱讀。出版《救國日刊》，供工人洋車夫及一般勞動大眾傳閱，指導其救國方法。出版《軍號三日刊》供校內同學閱讀。[41] 同時發動捐獻、慰勞、製棉衣和防毒面具等活動。看起來熱血沸騰，行動則相當理性和平。可是自 11 月 20 日清華歷史系講師吳其昌，率其妻及在燕京大學念書的弟弟，絕食請願，並寫一篇情文並茂的〈上呈國府請願之昭告總理文〉後，[42] 清華園裡的情緒開始激化。

五天後，清華和燕京學生二百人赴京請願，發表宣言，呈請國民政府接受下列四事：一、即派大軍援黑龍江省。二、宣佈對日斷交。三、如國聯對日暴行無積極制裁，中國應即退出國聯。四、請中央下令通緝賣國賊（ 張學良）。兩校學生如此強烈的要求，其實已將自己與政府處於對抗地位，緊張情緒難免升高，[43] 《天津大公報》於 12 月 5 日發表〈社論〉，告誡學生專心學識修養，體格鍛鍊和品行砥勵，使自己成爲鬥士，以備國家危急之需。[44] 梅貽琦兩日前才接掌清華，社論內容可能出於梅氏之授意。此後，清華的救國

---

40 《天津大公報》，民國 20 年 10 月 4 日。

41 《天津大公報》，民國 20 年 9 月 30 日。

42 《天津大公報》，民國 20 年 11 月 28 日。吳其昌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高才生，據梁啓超的說法，他參加了共產黨，畢業後任教清華歷史系。他計劃全家絕食四十八小時，由北平匍伏晉京，面呈蔣主席和副司令張學良。其呈文以昭告孫總理爲名，大意要蔣張二公作總理的真信徒，抵抗日本，不然則爲「背言賣國，或食言誤國」。據稱蔣主席「仔細閱讀後，點首稱是者再，態度懇摯。」事實上，吳氏全家不可能於絕食四十八小時的同時，有體力從北平匍伏爬行到南京。但是，他的文章和行動卻產生強烈的反應。

43 《天津大公報》，民國 20 年 11 月 26 日。

44 《天津大公報》，民國 20 年 12 月 5 日。

運動稍爲緩和下來。學生所作的都是一些宣傳性和建設性的活動，[45] 如清華學生自治會陳請國際聯盟調查團意見書等。[46] 換言之，學生的活動大致限於問題的認知，情緒的宣泄和外交的訴求，並沒有直接衝向政府。而且有些人感到戰局日緊，北平已成危城，準備離校避難，和過去激昂慷慨的情形大不相同。

就事論事，九一八事變後，學生初步的行動是單純的。政府對學生採取溫和理性溝通的態度，順勢輔導，一面對日本進行交涉（非談判），一面要求國聯干涉。但日本不顧國聯壓力，擴大攻佔東北領土，同時要求國民政府壓制反日運動。對照之下，顯得國民政府軟弱無能，故從 10 月中到 12 月中旬之間，北平、上海和廣州等地學生開始串連請願，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如上所述，他們不僅罷課，且搗毀外交部、中央日報社，圍鬧中央黨部，攻擊各省黨部。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還提出「打倒國民黨」和「打倒賣國賊」（張學良）的口號。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尤其激進。各大學校長因勸阻無效，紛紛請辭，直到 12 月 18 日國府採取強勢措施，明令取締學生越軌行動後，始暫告平息。[47]

## （二）上海事變與救亡運動之消退

接著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海陸空三軍進攻上海，遭到十九路軍及第五軍英勇抵抗，犧牲慘重，學生失去請願的理由，但因反日情緒未減，3 月，清華學生在中共地下份子領導下，與燕京等校舉辦「抗日殉國烈士大會」。[48] 5 月 25 日晚，由何基鴻（疑係何基，1932 級歷史系）講日本問題，「聽者極爲擁擠」。[49] 6 月在校同學歡送第四級畢業同學時，獻上「鐵和血」及「易水送別，慷慨悲歌」之詞，希望他們成爲捍衛國家的勇士。[50] 不過，這一年

45 〈清華抗日會最近工作〉《清華周刊》，卷 37，期 3（民國 21 年 4 月 20 日），頁 374-375。

46 《清華周刊》，卷 37，期 7（民國 21 年 4 月 20 日），頁 865-868。

47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冊 3，頁 78-124。

48 《清華大學校史稿》，頁 251-255。

49 《清華周刊》，卷 37，期 12，頁 1479。

50 《清華周刊》，卷 37，期 11，頁 1475。

沒有發生請願運動和嚴重衝突。

1933 年 1 月，日本向南推進，佔山海關，並聲明熱河爲滿洲國領域。[51] 北平各大學學生普遍感到不安，而有逃難的思想。[52] 清華學生自治會請求學校停止寒假考試，以便離校返里。 1 月 9 日，梅貽琦校長貼出布告，「値此國難危急之秋，大學生更應爲民眾表率，不應示弱於人，寒假考試仍當照常舉行。」學生不服，決議全體請假。教授也發表「告全體同學書」，勸阻離校，並照常舉行學期考試。但全校學生九百餘人，參加期考者僅三百餘人，請假離校者竟多達六百餘人。[53] 北平各校學生亦然。對此，北平市民三百六十五人憤而聯名呈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和財政部，謂「榆關失陷後，北平之大學生，不作領導民眾奮起抗日之準備，反而紛紛避難離平，實與國家培植學子之本旨大相背戾，故請停發停課期間之教育經費，移充抗日軍需。」[54]

對北平市民的批評，清華人覺得臉面無光，而思有所表現。春季開學後不久，也就是 1933 年 3 月 29 日，「清華大學抗日會」收到遼、吉、黑民眾後援會來函徵求路工百名，修築自遵化至玉田及遵化至沙河二線公路，以利運輸補給後，熱烈反應。兩日內就有一百零二人報名，其中有清華學生九十人，組成八個分隊。這種具體的愛國行動，得到校方的鼓勵。 4 月 1 日晨六時，全體隊員集合於大禮堂前，梅校長親加訓勉後，就由遼吉黑後援會專車接送進城。梅校長和陳福田教授還親送至燈市口貝滿中學前。隨隊者還有三名校醫，和清華所備慰勞品鹹菜二千八百斤。清華抗日會所組成之「救護隊」隨後亦出發至秦皇島。[55]

總之，這一年中央與地方教育經費並未大增，一切教育改革計畫，並未如願實現。不過，由於教育部已逐漸建立權威，「全國學校的安寧，殆爲十

---

51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3，頁 125-218。

52 《天津大公報》，民國 22 年 1 月 29 日，版 3，北平〈大學生逃考——教部令各校呈報核辦〉。

53 《天津大公報》，民國 22 年 1 月 12 日， 14 日，版 4。

54 《天津大公報》，民國 22 年 1 月 18 日，版 4，〈北平市民具呈中央停發停課期間教費案〉。

55 《天津大公報》，民國 22 年 4 月 2 日，版 4。

餘年來所未見」。可是汪、蔣二人對日本在東北的侵略行爲，採取妥協態度，卻埋下了不安的種子。[56]

## 三、清華與一二九運動

一二九運動的背景有四：一、日本乘中國之危，於 1935 年 6 月 10 日，藉口親日份子白逾桓[57] 等人被暗殺，逼迫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及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辭職，並要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口頭承認黨政軍退出華北，和禁止排日活動。此即被批評爲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58] 及中央以宋哲元爲平津衛戍司令後，日本不斷對宋施壓，策動「華北自治」，脫離中央，以便完全爲日本所控制。[59] 日本的蠻橫行爲，激起國人的反日情緒。而南京政府以國力不敵日本，乃採妥協政策，[60] 遂不爲一部分人所諒解。二、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國民黨採取「安內攘外」政策，[61] 儘

---

56 《王世杰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9 年），冊 1，頁 10-11。王氏指出對日妥協的惡果有七：一、民氣與士氣消沉（因取締新聞與言論，禁止排斥日貨）。二、無恥政客和漢奸可公開活動。三、忠實有氣節者，漸不安於位。四、日本少壯派軍人氣燄高漲。五、國際對華同情心消失。六、國民黨道義構成消失。七、冀察平津名存實亡。

57 白逾桓，湖北大冶人，武昌文普通中學畢業，明治大學法政科畢業，辛亥革命期間與宋教仁赴東三省聯合馬賊革命，革命後任湖北都督府參議，民二眾議院議員，討袁失敗逃亡日本。主張湖北獨立。民國 24 年任天津《振報》社長，以親日嫌於此年 5 月 3 日夜被刺。《現代支那人名錄》，冊 1，頁 37；《湖北文獻》，期 17，頁 62。

58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3 年），冊 3，頁 478。何梅協定之內容爲：一、本日已下令撤退河北省內黨部。二、第五十一軍明日起移駐河南。三、第二十五師、第二師決於一個月內他調。四、政府已重申禁止排外排日。據《王世杰日記》，冊 1，頁 13-17，王謂何應欽和汪蔣二人均「力主屈服」，惡果之一是「民氣與士氣消沉」。

59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 62 年），頁 92-109。案宋哲元原爲馮玉祥西北軍舊部，中原戰爭後受中央改編爲二十九軍，宋任軍長，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爲師長，秦德純爲總參議。同上書，頁 10-20。

60 蔣中正，〈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民國 23 年 10 月〉，《中國現代史料選輯》（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民國 74 年），頁 209-260。

61 蔡國裕說，中央確立「攘外必先安內」國策以後，「國民心理漸趨安定」，《中共黨史》（新店：國史館，民國 77 年），頁 302。其實是相反的，如果民心安定，學生就不可

管有一定的理由，但也失去民心。三、中共於 1934 年 10 月因被國軍第五次圍剿而西竄，又被追擊，危在旦夕。[62] 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爲緩和國軍追剿，發表「八一宣言」。[63] 此一宣言，主要宣誓以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爲軸心，組成「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毛澤東等到此年底召開瓦窯堡會議時才見到此一宣言，接受統一戰線策略。而清華學生姚依林等人，早就從北平法國人的書店中看到此一宣言。宣言中強調國防政府有十大責任，諸如收復失地、安定民生、沒收日本在華財產和漢奸財產、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增加薪餉、改善工農軍學生活、實行民主自由、釋放政治犯、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各民族一律平等等。[64] 可以說是一張漂亮的政治「滿漢全席」，它卻博得民主派人士、學生和若干民眾的支持。這就是中共北平地下黨份子發動並能完全掌控一二九運動的基本原因。[65]

在國、共和日本的三角對抗性敵我矛盾中，日本實力居於上風，中共居中，因其能順應民族主義情緒，提出統一抗日政策，取得不少人民同情，國民黨的安內攘外政策，則爲形勢所迫處於下風。日本儘管希望「日滿支共同防止來自外蒙之赤化。」但骨子裡既反共亦反蔣，自信能一舉消滅正處於惡鬥的國共兩黨。中國大陸歷史學界之所以重視一二九運動，是認爲它有下列四個歷史意義：一、它是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轉折點。二、它是劃分中國反動時期和革命時期的一個標志。三、它是北京學生運動的一個轉折點。四、

---

能被中共地下份子所用了。

62 蔡國裕，《中共黨史》，冊 1，頁 253-316。

63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冊 3，頁 495。

64 該宣言見《一二九運動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7。

65 關於八一宣言何時從莫斯科傳到北平學生手中的問題，有人說要到 12 月下旬中共派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後，北平學生才知道的。但姚依林說他們於 11 月 18 日成立北平學生聯合會前後，就已從英文本《共產國際通訊》和《共產國際半月刊》上看到八一宣言了。而這些刊物是從北平飯店一樓一位法國人所開的法文圖書館（實際是書店）中，買來的。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戰鬥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列》（北京：清華大學校史編研組，1985 年），頁 99。

它是清華學生革命化的起點，而且立刻成爲全國學生運動的主要陣地之一。[66] 清華之蔣南翔、姚依林和黃誠等人是此一運動的主要領導者。

一二九運動發動於平津，蔓延及全國。其規模比九一八救亡運動爲大，也較爲暴烈。現在已證實係受中共地下黨員影響，但當時卻沒有人肯承認。學生運動目標，既要政府抗日，又要向政府爭取「結社集會和言論出版自由」。[67] 最後主張必須「全國一致反抗政府，才能夠抗敵」。[68] 試想打倒一個政府需要多少時間，新政府從成立到穩定運作又需要多少時間。虎視眈眈的日本，豈會坐失良機？學生居然迷信愛國無罪革命萬歲的邏輯，公然和政府、校長、教授以及所有反對他們的人對抗，衝突和流血在所不顧。此一運動雖然於一個月內暫時結束，但餘波蕩漾到 1936 年底，只是名目不同而已，各學校幾乎陷於癱瘓。對清華來說，此一運動造成空前的內部分裂和衝突。茲依時序介述清華之「驅逐沈、畢案」、「反自治請願運動」、「二次請願運動」、「救國會」包圍「教授會」、「護校團」對抗「救國會」、「憲警入校捕人」、「抬棺遊行」、「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和二十九軍南調」，和「西安事變後的校園衝突」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經過情形。

## （一）一二九前夕：警察入校捕人與沈秘書長之被逐

前面說過，清華早已有共黨地下組織。北平市公安局懷疑清華學生社團「現代座談會」有共黨分子參加，乃於 1935 年 2 月入校捕去學生高承志、艾光增、呂明義（均未畢業）等十一人，經數度審訊後，釋放八人，扣留高、艾、呂三人。[69] 公安單位從審訊中，獲得某些線索，於 3 月 11 日清晨五時，聯合北郊區警察，再度驅車直入清華第二、四、五、六各院，及女生宿舍，再度捕去男女學生十人。梅校長和秘書長沈履面請北平市國民黨黨委董霖保釋。公安局遲至 14 日傍晚，始釋放這十人及上次逮捕的高承志。艾光增和呂

---

66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頁 128， 132-133；《清華大學校史稿》，頁 283-285。

67 〈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爲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 1935 年 11 月 1 日；及〈北平十五個大中學校宣言〉， 1935 年 12 月 6 日，都表達同樣的理念和訴求。《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01-905。

68 〈院校教職會告平津學生書〉，《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8 日。

69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15 日。

明義仍被拘留。[70]

學生懷疑秘書長沈履[71] 和庶務主任畢正宣，打電話給公安局不要釋放被捕同學。沈履出身清華，有豐富的學養和行政經驗，學生爲什麼有這種懷疑？原因是 13 日上午張崧年（又名申府）教授上邏輯課時，點名王瑤不到，知其被捕。學生問教授有何消息。張說昨日在城裡聞一位市黨部朋友說：市黨部本就要放人，「嗣聞學校裡有人打電話去要求暫緩，所以沒有放。」張崧年強調只說「有人」，且不相信有此人。[72] 不過，張氏很可能作了某種暗示。或者共黨地下組織黃誠等人，平時就不滿沈、畢二人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因沈曾任教學潮最兇的中央大學，學生可能懷疑其爲國民黨特務。否則「學生會」怎能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於 3 月 15 日晚上召開全體大會，通過：「請秘書長沈履及庶務主任畢正宣自動辭職，即日離校，否則即行驅逐案」，[73] 並成立「驅沈、畢委員會」，謁見校長。學生不待梅校長查明真象，[74] 就在校園中遍貼驅逐沈、畢之宣言標語，除批評沈氏陷害同人、操縱學生會、濫用

[70]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12 日，3 月 15 日。這十位被捕的學生姓名如下：王瑤（1935 級中文研究所，後任清大中文系講師）、王森堂（1936 級外文系）、王岷源（1934 級外文系）、馮鏡（1936 級外文系）、趙文璧（1937 級社會系），及後來未曾畢業的李成山、趙正楹、張新民、許留芬、和柳無垢。柳乃文壇名人柳亞子之女公子。釋放前還令柳生撰寫「反共宣言」一文。

[71] 沈履(1896-？)，字茀齋，四川成都人，清華 1918 級，芝加哥大學社會系學士，威斯康辛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返國後任上海浦東中學校長兼大同大學校長、江蘇教育廳科長、中央大學教授、暨南大學教授兼大夏大學教授、浙江教育廳秘書長。現任清華大學秘書長，後任西南聯合大學總務長，著有《青年期心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年）。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民國 29 年），頁 186。

[72] 〈張崧年致梅校長函〉，民國 24 年 3 月 15 日，《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19 日。但仔細閱讀此函，發現張氏之語氣曖昧，既說「希望清華永是講學之地，不願清華變成政事之場」，又勸學生「趕快恢復學生會」，「選舉權不可輕易放棄，地位萬萬不必過爭」之語。如張教授不點名沈畢，學生怎麼一口咬定，令人懷疑。張崧年(1893-？)，號申府，以號行。係巴黎大學哲學系博士，1932-1937 年間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思想左傾（尚未入黨）。由他代收宋慶齡捐助一二九運動經費，及稍後被拘捕審訊（下詳）諸事，可以確定驅沈案是他引發的。

[73]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16 日。

[74]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17 日。

公款、透支薪金和自加薪水外，還指控他 14 日晚學生會開會時，令人將電燈熄滅。[75] 校園緊張狀況於是遽升。梅校長貼出佈告，指責學生行爲脫軌，不循正當程序，也無事實憑證，誣控師長，徒添校園紛擾，有損清華形象。佈告說：

> 查近日校內發現揭帖多種，對於校中一二高級職員之措施有所指摘。昨日復據學生會整理委員會代表面陳各節。除關於事實各點應令確舉證據，以憑查核，並面諭不得有輕率舉動外，茲更爲諸生申言之。
> 按諸生對於學校公共福利，有所見聞，倘按正當途徑，報告學校，學校自願虛懷聽受，藉資參考。至於事無實據，任意行動，則不獨有損學校之名譽，玷辱同學之理智，且亦爲學校紀綱所不許。此意前曾一再公告，應爲諸生所共曉。
> 此次學生委員會未按正當途徑，陳報學校，聽候裁酌，即行四佈揭帖，實屬犯紀律，且予外人以極度不良之印象，殊深惋惜。諸生倘果愛護學校，當知所以補過之道。至於此次事件，學校目前正在嚴密調查之中，不久當有解決。諸生務各善體此意，安心學業，不得再有越軌行動，以滋糾紛，而干未便也，切切此布。
>
> 校長梅貽琦[76]

翌日教授會四十七位教授開會，由梅校長主持，朱自清紀錄，議決三事：一、同情沈遭誤會，派代表挽留。二、請校長對學生越軌行爲，嚴重訓誡，「如不悛改，即嚴加懲罰。」三、推舉朱自清、吳景超、吳正之、浦薛鳳等七人慰問沈氏。梅校長同時通告學生說，學生自治會代表所陳上述各節，經查明「全無事實根據」，出於誤會，並一一加以解釋。多數學生接受校長和教授會的勸導，安心上學，不欲再問驅沈之事。少數學生會代表仍不死心，擬再開全體大會，決定未來行動。[77] 沈履經教授代表挽留後不久復職，事件結束。校園恢復平靜者半年。

---

75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21 日。

76 〈梅校長佈告〉，《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19 日。

77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3 月 21 日。

## （二）清華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經過

### 1.山雨欲來風滿樓

先是日本爲了在華北建立「倒蔣、親日、防共」政權，逼迫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宣佈「華北自治」，爲宋所拒。乃利用舊官僚殷汝耕於 1935 年 11 月 24 日，宣佈「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佈自治。」[78] 學生均不能安心讀書。同日，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校長梅貽琦、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和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等數十人集會後，發表宣言：「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和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舉動」，並「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簽名的除上述四位校長外，還有傅斯年、任鴻雋、胡適、顧毓琇、張奚若、蔣廷黻和查良釗等二十餘人。[79] 時任中共清華黨支部委員的蔣南翔乃發動清華「學生會」起來響應，12 月 3 日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七百餘人參加，楊聯陞[80] 主席，作成三項決議：一、以本校全體同學名義通電全國，絕對否認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反對任何脫離中央或類似之華北自治組織。二、聯合平市各大中學，向地方當局作一大規模之請願運動。三、請願案由清華「救國會」全權辦理。會後即向全國發出通電，並採取行動。清華教授會亦於五日召開全體大會，商討應付時艱辦法。[81] 對這樣的形勢，南京政府當然有一連串的交涉、安排和行動，如通緝殷汝耕，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爲委員長，委員中雖然容納一些親日派人物，基本上仍由忠於中央的宋氏所掌控。[82] 但一場未明究竟的大規模請願運動，[83] 在清華「救國會」

---

[78]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 92-109。李氏對這一段華北危機，寫得非常翔實。

[79]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1 月 25 日。此宣言時間，顧毓琇《水木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73，誤植爲一九三七年春。

[80] 楊聯陞（1914-1990），1937 級經濟系，時任學生會主席，但受左派操縱，詳見前引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抗戰時留在北平，因日語教師錢稻孫關係，與美國和日學者交往，研究文史，後得美國哈佛大學遠東語文系助教授賈德納(Charles Sidney Gardner)之助留美，於 1940 年秋赴哈佛大學讀書，先後取得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爲知名漢學家。1959 年當選第三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見楊聯陞，〈憶錢稻孫先生〉，《清華校友通訊》，新期 17（民國 55 年 7 月 29 日），頁 4-11。

[81]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4 日。

[82]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 117-128。

[83] 這裡說它是一場未明究竟的請願運動，指的是政府和學界間溝通困難，有一片模糊地

聯絡策劃之下於是展開。

### 2.受挫折的請願運動

12 月 9 日晨七時，清華學生六百餘人（約為全校人數一半），清華由蔣南翔等領隊；燕京學生四百餘人，由黃華等領隊，[84] 共乘汽車三十餘輛，向城內出發。當局聞訊關閉西直門和其他各門。兩校學生未能入城，就在城外集合不散。在城內，軍警把守各大學校門，不讓學生外出。但仍有學生六、七百人衝出校門，集合於新華門，手持請願小旗，高呼口號，要求謁見何應欽部長。[85] 時何已赴湯山，由侯成代表接見。學生提出六點訴求：一、反對所謂自治運動。二、請何宣佈交涉經過。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內戰。六、准許言論集會結社自由。[86] 侯允代為轉達。學生另要求侯氏通知地方當局打開城門，讓清華、燕京學生進城。侯以非職權所在不允。學生要向北平市政府請願，被警察阻止。學生轉赴西直門，思與城外同學會合，惟在護國寺被警察攔阻。東北大學學生與警察衝突受微傷，八人被捕。學生又結隊東行，至王府井大街，途中各校學生陸續參加者增至千人。學生沿途散放傳單，呼口號，五時到霞公府，才被公安局消防隊用水龍沖散。在城外之清華、燕京學生於四時十五分，亦被各校當局勸阻回校。城門開啓，全市交通恢復原狀。[87]

總觀這次請願運動，值得注意者四：一、遊行係由清華發動，但清華、燕京兩校千人沒得進城，衝突較小。二、在城內之學生雖云到王府井時多達千人，但胡適說他這時正在該處，見學生「人數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88] 三、遊行訴求中，提出停內戰和言論結社自由，係受到「八一宣言」的影響。

---

帶，即政府無法對學生說明「以妥協爭取備戰時間」的底線，而學生則誤認中國有力量和日本一搏，政府軟弱無能。

84 顧毓琇，《水木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269。

85 何應欽於 1935 年 12 月 3 日晚抵北平，與宋哲元晤談，一致對日，商得中央同意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見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 117-121。

86 學生的六點要求，僅第一、四、五點符合此次請願目的。第二點對日交涉經過屬機密，不能透露。第三、六兩點則為日後之學運發展鋪路。

87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10 日。

88 胡適，〈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15 日。

也和上海救國會王造時的主張相呼應。四、北平市長秦德純不許警察帶槍械和警棒，只許用水龍，因天寒水冷，一沖即散，可免傷人引起更大衝突。之所以選在霞公府沖散學生，係怕學生走向東交民巷，會被日軍射擊，是不得已的措施。[89]

### 3.罷課與復課之爭

請願運動總算和平結束，但請願目的沒有達到。清華和燕京學生被阻城外，更是十分懊惱，於是有人造謠說清華有一女生死亡，醞釀繼續罷課。燕京學生自動停課一日，北大不安，其他學校到者亦不齊。看起來，學生企圖以「自廢武功」的罷課手段，逼迫政府就範。清華、燕京、北大、師大等校長乃於十日集會，勸導學生安心上課。會後，梅校長於晚上發出如下的佈告：

> 頃聞學生中有提議全體罷課者，如果屬實，殊屬非是，在此時局多故之際，諸同學應努力於實力之培養，切不可荒廢學業，作無代價之犧牲，望各安心，勿得有越規行動，是為至要，此布。[90]

清華教務長葉企孫和四位院長馮友蘭、吳景超、陳總、顧毓琇及各系主任，亦於同晚勸告諸生，並一一澄清謠言的不確實。[91] 學生則無動於衷。14日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梅貽琦、平大徐誦明、燕大陸志韋、師大李蒸、東北大學王卓然又發表「告同學書」，謂同學請願目的已達，並無女生傷亡，被捕者均已釋放，同學應即日恢復上課，勿別生枝節，虛擲光陰。

何應欽部長亦致書各校長，慰問學生云：中央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處理平津政務。[92] 各部門負責人「均富有國家思想，人事之變更，並不影響國家之統一。」望同學恢復上課，埋頭學問，為有用之材，始裨益國家，勿

89 《秦德純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 70 年），頁 41-47。

90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13 日。

91 同上。

92 如前所述，由於日本策動華北自治，中央撤消北平軍事委員會，派何應欽北上主持政務，何與宋會商並經中央同意，於 1935 年 12 月 11 日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十七人，其中屬二十九軍系統者六人，東北系統四人，親日派七人，基本上，此組織「既非自治，亦非日人傀儡」，完全聽命中央。見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 62 年），頁 117-128。所以下面何應欽和秦德純對學生的談話是真實的，但學生不信罷了。

作無益的課外活動。[93] 北平市長秦德純亦呼籲道：此次華北外交，係由中央主持。市政府並未壓迫學生運動。希望同學即日復課，但「師大和北大學生仍有堅決主張罷課者。」清華和其他學校也不肯上課，氣氛十分緊張。

在中共份子影響下，12 月 16 日，北平城內外各校學生又進行第二次請願，弘達中學打頭陣，衝入阜成門。清華、燕京千人也跟著進了城，和城內各校學生會合，持灰色木棒，四出攻擊。警方再用水龍噴射，學生搶水龍，雙方於是衝突，學生有微傷者外，十餘人被捕。警察也有二十人輕重傷。至晚上十時始散。被捕者經訊問後於翌日釋放。[94]

梅貽琦、蔣夢麟等又召開會議，20 日發表「第二次告同學書」，表示沒想到「第一次告同學書」發表後，竟有 16 日的遊行。指出赤手空拳的群眾運動，只有荒廢學業，絕非有效的救國方法，望同學即日復課。為安定政局，各校教授代表亦走訪冀察政務主委宋哲元，表達關懷之意。[95] 北平市公安局局長劉玉書 21 日發表「勸告學生書」，除恭維學生品學和愛國心外，還說有不良分子滲透其中，證據是在學生散發的傳單中，有「歡迎紅軍等語」。劉警告說，平津華洋雜處，稍一不慎，牽動外交干涉，禍在眉睫。希望同學專心讀書，勿為奸人所用。[96]

但是各校學生已受共黨份子所主持的「北平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學聯」）操縱，[97] 對各校校長、教授和有關當局之勸告，無動於衷。當上海和南京的同學已恢復上課時，平津學生 22 日尚無復課跡象。《天津大公報》於是發表長篇社論，呼籲同學復課。[98] 23 日，宋哲元以「歷次學潮均有野心家

---

93 〈北平各大學校長告同學書〉，《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14 日。

94 〈秦德純談學潮經過〉，《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2 日。北大也參加此次請願，九人受傷，五人被捕，經總務長鄭天挺交涉獲釋。鄭嗣仁，〈鄭天挺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5，期 3(1998)，頁 48。

95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1 日。

96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2 日。但北平公安局並未抓到「不良分子」的確實證據，只是猜疑。

97 據姚依林回憶，北平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於 1935 年 11 月 18 日。〈一二九運動回憶〉，《戰鬥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夕》（北京：清華大學校史研編組，1985 年），頁 99。

98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3 日。

操縱，……甚至共產黨潛匿其間，鼓動誘惑，危害國家」爲由，電天津各校提前放假。[99] 天津除北洋大學和南開大學外，其餘大中小各校，均遵命提前放假。[100] 北平之清華、北大等校長則認爲離放寒假僅約兩週，上課日期將畢，考試日期即屆，除去新年放假三天外，所剩無幾，實無提前放假之必要，力勸學生復課。而北平「學聯會」反對復課，並否認公安局「共產黨計劃發動全市大暴動」的指控，說該黨「實無此力量」。同時計劃發動第三次請願，擬派遣代表分赴各處宣傳，以「喚起全國愛國人士之同情」。[101]

北平「學聯會」已掌控北方學運，成爲可以和大學校長、教授和政府官員談判的對手。其於 12 月 27 日所召開「慰勞大會」，就是彰顯其權力的一個標幟。到會者不下五、六百人。其中有清華北大等四十餘校代表二百二十一人，受傷學生三十三人，新聞記者和各校教授來賓四十九人。大會主席團由北大、燕京、中國三校代表擔任（清華地下黨有意迴避）。會場陳列由「學聯會」及各地學生會贈送的慰勞品，和女生救護隊贈送給受傷同學的美麗鮮花，聲勢浩大。會議決定七點今後方針：一、有條件復課（提出九個條件，內容不詳），二、切實執行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三、舉行募捐運動，四、努力教育自己，五、擴大救國宣傳，六、募款一千萬建紀念碑，七、最近期內成立華北學聯會。會中雖有人建議學聯「避去秘密行爲，成爲公開團體」，「並望及早解決復課問題」，[102] 但未被大會採納。

清華等大學校長會議於是決定： 1936 年 1 月 4 日復課， 20 日起放寒假十四天， 2 月 3 日開學註冊， 13 日上課。[103] 但由於「學聯會」的抗拒，各校復課努力終於失敗。清華等校不得已乃決定自 1 月 5 日起提前放寒假， 2 月 1 日開學。[104]

---

99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4 日。

100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5 日。

101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4 日。

102 〈平學聯開慰勞大會〉，《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28 日。

103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 月 3 日。

104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 月 6 日。清華公佈放寒假後，學生紛欲返里，但被糾察隊攔阻，故實際離校者僅五百人。

顯然的，在共產黨份子操縱下的北平「學聯會」，已成為平津學生權力團體。準備和政府部門及學校當局鬥爭到底。這次慰勞大會抬高其聲勢，對復課提出九條件，連續罷課達二十五日，並拒絕蔣中正院長之召訓。清華、燕京兩校「救國會」且自組南下宣傳隊，擴大北平學聯的組織和影響力，[105] 給政府和學校當局增添了極大的麻煩。蔣中正院長召訓學生的目的最後亦告失敗。

4.蔣院長召訓安撫各校代表失敗

由於學生運動鬧遍全國，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辭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兼任行政院長。為讓學生了解政府之處境和對日政策，訂於 1 月 16 日召見全國學校領導人和學生代表，以平息學潮。教育部通知每校選派代表一至三人。由於主導請願運動的北平「學聯會」決定「不派代表南下」，[106] 所以各大學代表多由校長指派。清華除梅校長外，指派了教務長潘光旦和學生會正副主席楊聯陞、孟復（1937 級政治系）三人。[107]

南京國民政府為歡迎各地代表，特設「招待處」，以雷震為總幹事。安排旅館、交通、參觀、餐宴和演講等節目。1 月 14 日全國學界代表到達南京者已有二百七十四人，其中大專校長八十五人，學生代表一百十八人，中等學校校長七十一人。次日增至三百餘人。日程是：15 日蔣氏分批聽取各地代表的報告，16 日宣示政府對日政策。[108] 17 日參觀南京市建設和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桂永清）步騎兵操演，然後到靈谷寺公祭陣亡將士（張伯苓

105 清華燕京「南下聯絡宣傳隊」團長為清華之陳元（未畢業），12 月 15 日離平南下，分赴京滬，在上海發動四次學生及民眾「愛國運動」，京漢粵等地學生也紛起響應。在南京籌組「京滬學聯會」，並向全國各地大中學校聯絡，計劃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該團於同月 30 日完成任務，返抵北平。《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 月 1 日。

106 《天津大公報》，民國 24 年 12 月 30 日。北平「學聯會」不僅決定不派代表南下，且於清華、北大、師大和武大等校，驅逐南下代表出校，氣燄囂張，甚不得社會同情。一年後檢討，承認錯誤。認為應派代表南下，正面向政府提出訴求，並利用機會向其他代表統戰。如此則既獲得社會同情，亦能擴大學聯會的組織和影響力。〈一二九運動一年來之史的檢討〉，《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56。

107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 月 6 日。

108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 月 15 日。〈蔣公接見學界會談〉。

主祭）。18日由交通、鐵道兩部安排船車，免費歡送各地代表返校。[109]

活動的重頭戲在16日，此日行程緊湊，代表們既忙碌又興奮，值得一記。早上八時至中央軍官學校，由校長張治中引導參觀。午餐在官校禮堂進用。餐畢由張校長致詞約半小時，言詞悲壯，各代表都感振奮。下午一時半，各代表到「勵志社」禮堂就座，三時著中山裝的蔣院長到達禮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先由教育部王世杰致歡迎辭。後由蔣氏講話，長達三個半小時。七時中央黨部和教育部聯合歡宴，王部長致辭時表示「平津各大學決不南遷」，宴會至九時始散。[110]

蔣氏訓話內容應該是各代表最爲關心的。蔣氏對日政策已見他1934年10月發表的〈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111] 他的談話內容不出該文範圍。要點有三：一、說明近年國際形勢及中日交涉經過。二、表示決不簽訂任何損害中國領土主權之條約，和秘密協定。爲維持國家生命，必要時不惜犧牲。三、國家力量之養成，在健全文化經濟等組織。各學校校長學生，於領導全國熱誠愛國外，更須守紀律、負責任，對國家命運應有信心，勿受人挑撥離間，或因愛國之故而破壞學校及社會秩序。若能一心一德，向前邁進，作有秩序之奮鬥，國難必能解除。[112] 文辭懇切，合情合理也合勢，聆聽者無不動容。

所以17日，有一百六十四位校長代表鄭重宣言：「一、擁護國家領土之

---

109 雷震任招待處總幹事，其餘各組主任及幹事，均由教育部、中央黨部及行政院分別派員擔任。給各地代表分發出席證，安排旅館和參觀活動。〈各地代表已紛紛入京〉，《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1月11日。

110 〈蔣院長昨作三小時演說，坦白宣示政府方針〉，《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1月17日。

111 此文分析中日間的僵局、僵局不宜延長、雙方的錯誤、以及解決之道。希望日本停止侵略。雖承認國力不及日本，但決不放棄任何領土。其中談到中國內部凌亂的一點，與學潮有關，特摘錄如下：中國人不能固守外交秘密，政府尚未決策，民間已自喧騰。實力既不能頃刻增強，而表現又甚虛驕，日本乃乘勢進逼。更不幸的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民間各派、國民黨和黨外，甚至國民黨內部都不一致。「因之內亂與外患益見嚴重。」見《中國現代史史料選輯》（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民國74年），頁208-236。按中日和談持續至勝利前夕，未曾中斷。

112 如上註110。

完整，信任政府，並反對任何分離運動。二、盡力實施切合國難時期需要之教育。三、保持教育的生命，主張裁制罷課及破壞紀律之舉動。」[113] 同日一位學生代表亦對記者說：「各生對蔣訓話頗多感動，印象異常良好，黨國領袖對人民如此坦白談話尚為創見，到會各人均覺得彌足珍貴之機會。」[114] 但是由於造反派北平「學聯會」抵制南下，所以聆訓代表返校後亦難發揮作用。清華就在代表返校後發生最為嚴重的「考試風潮」和「學生被捕」事件。

## 四、從外鬥到校園內鬥

### （一）考試風潮：學生「救國會」要挾「教授會」

清華原訂於 1936 年 2 月 1 日春季開學當天，補行上學期因愛國運動未舉行的期考，目的希望學生利用寒假專心溫習功課。學生以準備不及，要求延期。學校改於 2 月 24 日舉行。學生「救國會」決定請再延期，聲言如校方不延期，則拒絕補考，並自動進行非常時期教育。對「救國會」的上述決定，各系主任開會討論，認為事態嚴重，宜提交「教授會」處理。 2 月 19 日下午，「教授會」正在科學館樓上開會討論此事。「救國會」主席黃誠竟率領學生五百餘人集合操場，先遊行全校一週，再到科學館樓下，由臨時主席劉毓珩（未畢業）宣示：一、為實施非常時期教育和生活，要求免考。二、否認學生反對學校，「願永遠與學校合作」，並高呼「清華師生合作！」、「免除學期考試！」等口號。然後派代表黃誠、劉毓珩二人上樓晉見教務長潘光旦。潘勸學生散去，學生不聽。「教授會」以學生跡近要挾，仍決定如期舉行期考。學生不滿，上樓大鬧會場。「教授會」主席張奚若勸阻無效，憤而發表宣言，全體辭職。宣言大意謂：

> 同人等於本日下午四時開會，討論補行上學期考試問題時，有學生多人聲稱代表全體，在外高呼口號，要求免考，繼復包圍會場，並有代表數人，屢次衝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之下，既感執行職務之不可能，

---

[113] 〈百餘校長鄭重宣言〉，《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 月 18 日。

[114] 如上。

又愧平日教導之無方，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國人。除向校長辭職外，
謹此宣言。張奚若等七十四人（實際簽署者六十八人）[115]

時梅校長人在南京，「教授會」立即去電報告。「學生會」知事不對，當天晚上八時半召開全體大會，到者六百十九人，主席團爲陳元（未畢業）、劉毓珩、黃誠等人，決議：一、挽留教授，由「救國會」向教授解釋誤會。二、加強糾察隊組織，維持校內秩序。三、登報聲明此事真象，並表明態度。四、立即執行非常時期教育及免考辦法。但誓言：「如有人從事破壞時，應由救國會組織特種糾察隊，負責制止。」至午夜十二時尚未散去。[116] 由此可見清華「學生會」與「救國會」沆瀣一氣，欲以糾察隊掌控清華，拒絕補考和正規教育。

「救國會」向「教授會」統戰失敗，公然對抗。學校則因教授辭職，全校幾乎陷於癱瘓狀態，須待梅校長回來解決。[117] 想讀書的同學不滿，出來組織團體反對「救國會」，於是形成另一波的校園衝突。

## （二）「護校團」反對「救國會」

清華教授總辭後，學校停課，僅有體育課等部分教員，及在秘書長沈履以下之行政人員照常上課辦公。「救國會」（因以大禮堂爲集會所，又稱「大禮堂」派）由原先屬於「學生會」的任務性組織，現則轉變爲獨立的校內權力機構，且擁有糾察隊和特種糾察隊的半武裝組織。反抗政府和學校權威，不須徵求學校同意，竟自實施非常時期教育。脅迫同學抗拒復課和補考。不

115 〈清華大學又起波瀾〉，《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0 日。那六人不簽名，不詳。

116 〈清華大學又起波瀾〉，《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0 日。所謂非常時期教育和生活，即每日早晨七時早操，星期六和星期日野營，實行食宿集中，如有人不到，則由全體實力對付。這表明救國會已類似軍事組織，以集體之名，實行獨裁之實。

117 〈清華昨停課〉，《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1 日。記者分訪了學生救國會代表、教務長潘光旦、秘書長沈履、教授馮友蘭。各方立場如正文中所說。學生解釋事件原因是教授會拒絕接受同學要求，同學一時氣憤所致。強調「那僅是一點誤會」，師生處境和目標相同，「並沒有任何衝突」，希望教授打消辭意，及早恢復上課。教授則以學生迹近要挾，堅持非舉行補考不可。潘對此事表示悲觀，亦無解決辦法，須待梅校長返校處理。曾被驅逐的沈履表示「恐難有解決辦法」。馮也不同情學生舉動。

滿「救國會」霸道行為的同學，在「同方部」[118] 國民黨團的支持下，組織清華「護校團」，2 月 22 日通電全國各機關和學校，指控「救國會」受共黨分子操控，行為非法，要求校方嚴懲，挽留教授。他們表示：

> 一、堅決否認現任救國會的非法行為及其法律地位。二、退出共黨下的學聯。三、挽留全體教授，遵守一切校規，並請學校當局嚴懲此次風潮主動份子。[119]

「救國會」對「護校團」之上述聲明，立即反擊。向校長報告事件經過說：

> 近有少數同學乘機組護校團，辱罵誣陷。本（救國）會領導六百同學請願，本係執行大會議決案，惟不能善導同學，致生此種不幸，自當深自引咎，極力設法解決，請轉達諸師長，即日復職授課，為學校留元氣。[120]

「救國會」堅持自己合法，承認行為偏失，同意復課，但不肯表明政治立場。對兩個社團的衝突，因梅校長不在，沈履秘書長不能處理，教授們也保持緘默。

23 日中午，「護校團」在北平大羹番菜館開招待記者會。由劉同聲（1939 級航空系）、張肖虎（1936 級土木系）二人主持，提出五點聲明，其中除挽留教授、遵守校規、否定「救國會」法律地位及退出學聯（但不提「共黨下的」四字）和前面的聲明相同外，增列：「否認學聯會舉辦非常時期教育方案，實行教育部所擬非常時期教育方案。」最後表示：在不反對任何黨派和擁護中央兩原則下，努力救國運動，並負糾正錯誤救國運動之責任。下午二時許記者會結束後，「護校團」成員彭永馨等五人，還到北平地方法院控告清華「救國會」負責人黃誠、錢偉長等十二人，任意散發傳單，指控「護校

---

118 「同方部」乃建築物名稱，為早期清華的禮堂，後改為俱樂部，因國民黨團部設立在此，故被稱為「同方部派」。

119 〈清華學生暗鬥甚烈〉，《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3 日。護校團領導成員為：劉同聲（1939 級航空系）、張肖虎（1936 級土木系）、彭永馨（1936 級政治系，標槍國手）、劉安義（1939 級中文系）、汪復強（未畢業）、鮑熙年（1936 級電機系）、紀富陞（女，1936 級政治系）、季復生等人。

120 同上。

團」成員彭永馨等五人為漢奸，毀壞名譽。法院受理，並定期開庭。[121] 結果未詳。

## （三）梅校長嚴懲「救國會」

在全校師生極度焦慮不安與期待的情況下，23 日下午梅校長從南京返抵清華，心裡已有腹案。[122] 翌日上午十時召集全校學生千餘人訓話。教務長潘光旦和秘書長沈履陪同梅校長步入大禮堂時，受到全體學生熱烈鼓掌歡迎。梅校長常和政府及國民黨要人接觸，知有地下黨操縱之事，但為愛護學生，只再度誥誡各生遵守校規，不得再有越軌情事。[123] 同時宣佈三項決定：一、上學期因請願沒有舉行的大考，必須補行。二、為維護學校紀律和教授尊嚴，「救國會」委員黃誠等十一人各記大過兩次。三、清華不接受「救國會」提出的「非常時期教育辦法」。明確宣示，凡不願意接受清華之教育者，可以離去。經過梅氏的這番訓誡，多數學生決定遵命，按期應考。風潮到此暫時解決。梅校長的訓詞和師生的反應，都反映了當時清華校園裡的師生倫理關係，要點如下：

一、清華能有今日之成績，皆賴過去師生於學行上努力之結果，大家應力加愛護保持，以免將來蒙受不良影響。

二、學校中以「施教」與「受教」二者為主體。師長以才能學識訓練大家，學生應虛心受教。學生如認為所施者非其所需，儘可離去清華。若認為根本不需學校訓練，亦請離開學校。

三、紀律之維持更為重要。非常時期之紀律，更當遵守。本次事件，部分學生包圍教授會，要求免考，本人認為殊為不當。學生對於教授失禮，且

---

121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4 日。救國會領導成員多為共黨分子，或思想左傾者，十二人名單為：錢偉長（1935 級物理系）、葛庭燧（1937 級物理系）、高承志（1936 級外文系）、郝威（1936 級外文系）、沈海清（1937 級經濟系）、郭見恩（女，1938 級歷史系）、黃誠、華道一、楊戊生、陳元、劉毓珩、陶家淦。前面錢偉長等六位畢業，僅錢偉長一人為今日大陸名科學家。後六人不是被開除就是中途輟學，多無好下場。

122 因梅校長於南京時已與政府及教育部門接觸，取得共識，要整飭學校紀律，嚴令不受課受考學生離校，和制裁有煽動行為者。《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 月 29 日。

123 〈何炳棣院士關於搗毀清華救國會事件〉訪問紀錄，1998 年 6 月 16 日。

欲以事出誤會卸責，更不應該。當時各教授最感痛苦者，爲學校綱紀之破壞，認爲無繼續施教之可能。本人除敦勸各教授復職外，並致歉意。

四、至同學請求免考之事，礙難照准。本人負教育責任，勢必補行期考。望大家遵守應試。至非常時期教育，學校已擬定具體辦法，俟教授會同意，即可施行。若學生擅將所擬「非常時期教育方案」送校，請照實行，則斷爲不可。

五、於當前情勢下，同學應同心協力，和衷共濟，向合理方面努力學習，使本校教育得以順利發展。

六、至於領導同學包圍「教授會」，鼓噪要挾之「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成員：黃誠等十一人，「本應立即開除學籍，姑念該生等事後已知深自引咎，特每人記大過二次，以資儆戒。」[124]

關於補考事，校長辦公室 24 日貼出通告：「改定於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六日舉行上學期學期考試，自即日起至二月二十八日止，暫停上課，俾資溫習功課。」[125]

經過梅校長這番明快的處理，各教授「咸謂此次事件乃清華自成立迄今二十餘年所未曾有者。校長既已懲戒肇事學生，並敦勸復職授課，若果學生自今痛改前非，努力學業，校內綱紀恢復，自可打消辭意。」[126] 至此一場嚴重的師生衝突暫時結束。

關於這次考試風潮之責任問題，有一位參加過一二九請願的清華二年級同學，提出六點中肯的批評。他說：一、風潮之主要責任在「救國會」，因爲他們早已決定免考、請願和罷考三步驟。但校方未能及時勸阻，也有責任。二、在「救國會」領導下參加請願，阻礙「教授會」會議者僅二百餘人。他們使一千二百人不能上課，不對。三、「教授會」憤而集體辭職，不顧要上

---

124 〈清華大學風潮解決〉，《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5 日。查這十一人除黃誠外，尙有陳元、劉毓珩、陸璀、宮日健、黃日開、周嘉祺、葉篤廉、丁則良、吳承明、劉汝賢十人，其中僅丁則良一人畢業（ 1938 級歷史系）。黃誠、陳元、劉毓珩、吳承明四人於 1936 年 6 月被開除。錢偉長等九人未被處罰，錢幸得完成學業，爲名科學家。 被罰之吳承明亦成名經濟學家。

125 如上。

126 如上。

課的千餘同學，也不對。四、教授中有人公然「在班上宣傳分裂，反對政府」（可能暗指張申府），[127] 而學校當局「竟亦裝著不知不聞」。這次學生包圍教授會，那位教授亦有些責任。「在如今國家千鈞一髮之際，鼓動學生，煽起風潮，是國家民族的罪人！」五、救國工作應在不停止學業的原則下進行。唱戲者不可毀掉戲台，所以應「立即復課」。六、「救國會」以少數操縱沈默的多數，談何民治主義！[128] 這位學生沒有提到「救國會」成員的政治背景問題。但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和清華「護校團」都指出，「學聯會」受到共產黨份子操縱，如反對南下聆訓，主張免除考試，干涉學校行政等，一若清華「救國會」所為。又在〈學聯工作報告〉中」，有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提倡農工革命。主張全國一致反對國民政府，才能抵抗日本敵人等語。[129] 證明北平「學聯會」確實受到共黨份子操縱，而清華地下黨員蔣南翔、姚依林和黃誠[130] 等均在北平「學聯會」扮演重要角色。

地下黨的確控制了清華「學生會」、「救國會」和《清華週刊》，如他們於 1936 年 5 月出版了《救亡運動報告書》，完全從反帝、反封、救國的觀點，敘述一二九運動被軍警鎮壓的情形，[131] 以顯示其行動的正當性。由於「救國會」在校內的種種表現，為學校當局和「護校團」同學所不滿。西安事變後，被何炳棣等要求解散。這一段經過，留待下面詳述。

---

127 張申府（原名崧年），巴黎大學博士，清華哲學系教授，屬於左派。如前所述，在驅逐沈畢事件中，涉嫌煽動學生，1936 年初夫婦兩人曾一度被捕入獄（下詳）。1937 年 5 月與張友漁（共產黨）、黃松齡等左派教授，於北平成立「新啓蒙學會」，以「爭取當前民族解放的勝利」，再打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之門」為宗旨。同時在報端批評國民黨右派復興社、CC 團、黃埔系、藍衣社等組織。《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221-222。

128 〈一個清華學生對該校風潮之痛語〉，《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5 日。

129 〈院校教聯會告平津學生書〉，《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2 月 28 日。

130 黃誠由於在一二九運動中表現優異，被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劉少奇選拔為北平市委，並領導民先隊，參加領導籌建全國學聯和全國救國會的工作。1936 年 6 月被清華開除，此年冬起升任市委書記。姚依林亦於七七事變後升任天津市委書記。《一二九運動史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86 年），頁 115-116。

131 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編，《救亡運動報告書》（北平：清華大學學生會，民國 25 年 5 月），本報告長達 56 頁。

## （四）憲警入校捕人，學生毀車事件

那知一波剛平，一波又起。1936 年 2 月 29 日，正是清華學生開始補考的日子。北平憲警突然入侵清華校園，遭學生抵抗，形成僵局者兩晝夜。結果學生二十一人被捕。

在一二九請願後，行政院爲防範共黨幕後操縱，令各校「取締非法組織」。北平憲警當局遵命突擊檢查清華、北大、東北大學、中國學院等校。清華首當其衝。

29 日晨四時，北平憲兵司令部之憲兵，和北平市公安局警察二百餘人，拿著四十餘人的黑名單，分乘數輛警車，來到清華，破門而入，從第一院至第六院宿舍，按名一一對照學生證像片檢查。檢查結果，將地下黨領導人蔣南翔、姚克廣（依林）和方左英（1936 級土木系）三人及一名寇姓工友帶走，惟到清華西院門時，被學生包圍，搶回蔣南翔等三人。學生將憲警逐出學校後搗毀憲警用車八輛。

梅校長和潘教務長於此日上午九時在大禮堂召集同學訓話後，就進城去見市長秦德純、公安局長陳希文和冀察政務委員宋哲元，以求了解憲警爲何捕人，並謀解決之道。

學生會也召開臨時全體大會，決議：一、請校長立即保釋同學和工友（其實已搶回）。二、請學校保障以後不得再有憲警進入校門。三、加強同學組織，在問題解決前不舉行補考。四、請新任「救國會」委員立即宣誓就職，進行工作。五、一致擁護校長。六、電請行政院收回取締平津學聯成命。會後召集糾察隊擔任警戒，並派代表晉見校長。由此可見「學生會」、「救國會」和「學聯會」脅迫校方保護，並無妥協意向。梅校長雖分電行政院秘書翁文灝和處長蔣廷黻，設法請北平當局「緩和處置，以免激起意外」。[132] 但於會晤北平當局後，竟向學生表示，學校無力「保障安全」。

果然 29 日午後，校外憲警增多（蔣南翔《新清華》說三千人），並有三十餘人進入校內。學生鳴鐘集合五六百人，將憲警逐出校區並關閉校門。憲

[132] 〈梅貽琦致翁文灝蔣廷黻電〉，1936 年 2 月 29 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13。

警則層層包圍全校，情勢嚴重。學生再度集合，商討應付辦法，決定派代表晉見校長，惟因校長已進城，改向工學院院長顧毓琇和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請示，商議結果決定讓步，接受檢查，由學校派教授向警方交涉，只准派五十位憲警進來。全體同學則集合在體育館，聽憑檢查。「時蔣南翔躲避在鍋爐房，由工友掩護。姚依林躲在馮友蘭家，女生躲在朱自清家，還有學生躲在聞一多家」和華羅庚家者。[133] 但憲警入校後，逕赴各宿舍檢查，同時包圍圖書館和體育館。對已在體育館的同學，令女生外出，分男生為三部分進行檢查，自此日晚上七時到三十日晨五時結束。蔣南翔、姚依林等雖得倖免，但有二十二人被帶走了。其中，法學院七人，工學院四人，文學院三人，理學院二人，查無學籍者六人。[134]

事後梅校長發表談話，感嘆本校風潮甫經平息，又生此事，實屬不幸。指出學生搗毀車輛，是事態嚴重的原因。他說，黑名單中之四十餘人，係經軍警各方調查確定者，但被帶走之二十一人（方左英在外），多不在此名單之中。校方愧無保護之力，惟盼當局查證清楚，將無關者早日釋回。至被毀車輛，校方準備賠償息事。補考日期延至下星期六（3 月 7 日）舉行。[135] 顯然，梅校長已知蔣南翔、姚依林和黃誠等人的背景，如果治安單位手中確有證據，他也不反對他們入校捕人。

3 月 2 日梅校長又召全體學生訓話，承認憲警有入校傳訊學生的公權力，對肇事學生查明後一定嚴懲。希望學生安心上課，不得再有越軌行動。校內

---

[133] 這一段引文，見顧毓琇，《水木清華》，頁 270 。其前後之敘述見下註。在這裡，顧氏沒有提到他和馮友蘭讓學生接受檢查的決定。

[134] 〈清華大學檢查竣事：學生二十二人被傳訊〉，《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3 月 2 日。他們的名字如下：方左英（土木系，先前被搶回者）、林亮（ 1937 級政治系）、郭守田（ 1938 級歷史系）、施養成（ 1939 級政治系）、陳耀庭（ 1936 級政治系）、薛容（ 1937 級生物系）、劉述真（ 1936 級中文系）、韓鳴（ 1937 級經濟系）、王萬福（ 1936 級經濟系）、李捷參（ 1937 級經濟系）、寧梘（ 1936 級機械系）、張璐（ 1937 級電機系））、段龍（ 1939 級經濟系）、武遲（ 1936 級化學系）、譚三育（ 1936 級中文系）、陸欽尙（ 1936 級土木系），以下為未畢業者：馬忠、艾光增、葉渙通、孫世實、米泰恆、王玉發。

[135] 〈清華大學軒然大波：軍警檢查與學生衝突〉，《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3 月 1 日。〈清華大學檢查竣事：學生二十一人被傳訊〉，《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3 月 2 日。

課程必須照常進行，補考時間由各系調整。對無辜者，校方將設法營救。至於他未能制止學生暴行，則電教育部自請處分。[136] 梅校長的這種態度，必然不為左派學生所歡迎。3 月 7 日在「救國會」主導下，戚長誠等二十六人成立營救委員會。贈送衣物食品，遊說有關人員，爭取社會輿論支持，催促政府釋放同學。「救國會」雖承認犯錯，今後「絕對遵守全體公意」，接受「嚴格的裁判指導」，但又堅稱，共同對付敵人是唯一活路。[137] 意思就是說他們不會放棄運動學生的工作。

不知是否與清華營救活動有關，北平治安當局緊鑼密鼓審訊學生，中間還傳訊有共黨嫌疑的張申府教授及其夫人劉婉容（清揚）。[138] 13 日晚釋放郭守田、王萬福、馬忠、米泰恆、韓鳴五人，23 日釋放孫世實、陸欽尙、施養成、陳耀庭、葉渙通、劉述真、寧梘、張璐、薛容、李捷參、武遲十一人。他們都由教務長潘光旦和事務主任畢正宣以大汽車親自接回學校。[139] 其中，施養成因神經錯亂，送神經療養院治療。[140] 其餘五人留於陸軍監獄繼續偵訊，至 4 月 8 日下午釋放林亮、段龍和譚三育三人。艾光增（第二次被捕）、王玉發二人案情重大，原擬移送南京偵辦，但艾於 4 月 23 日獲釋，最後僅剩下王玉發一人。[141]

總之，這次憲警入校捕人，顯示政府壓制共黨操縱學運的決心，但並沒有逮到真正的主謀者，原因是學校愛護學生，同學也不忍心有人受害，所以地下黨份子就有恃無恐，為所欲為。至少教授中張申府、聞一多、華羅庚、朱自清和馮友蘭等都應知學生背景，卻未加勸阻，反使梅校長和多數教授，整日收拾學潮善後，受盡折磨，苦不堪言。

---

136 〈清華昨上課〉，《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3 月 3 日。

137 〈清華成立營救委員會救國會發告同學書〉，1936 年 3 月 7 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16-918。

138 〈被傳教授學生昨日尙無釋出消息〉，《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3 月 21 日。

139 〈清華被捕學生昨再釋十一人，其餘五人尙待復訊〉，《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3 月 24 日。

140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3 月 27 日。

141 〈清華被傳學生昨續釋放三名〉，《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4 月 9 日；〈清華被捕學生昨續釋放一名〉，《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4 月 23 日。

# 五、從抬棺遊行至西安事變

## （一）無端的抬棺遊行

北平「學聯會」和各大學之「學生會」，完全蔑視政府和學校權威，利用機會製造事端。有些活動實際與愛國無關。一旦被捕，又要求學校當局營救。這是政府領導人和大學校長最頭痛的時期。抬棺遊行便是最好的例子。

「學聯會」和北大學生會，在未知會北大校方的情況下，1936年3月31日上午，讓清華學生楊學誠從校外秘密運入一副空棺，放在北大第三院，爲傳說病死醫院之河北高中學生郭清[142] 舉行追悼大會。北平各校學生八、九百人（清華人也不少）與會。警方發現後報告北大當局。蔣夢麟聞訊詫異，會同警方親往勸阻。學生堅持舉行，並將該院正門封鎖，不讓外人進入。警方只好在院外包圍守候。及追悼會結束，學生爲迴避警方攔阻，竟動手拆掉三院後牆，將空棺經由孔德學校抬出到東華門大街轉北池子遊行，一路散發傳單。警察趕到，衝散遊行隊伍，捕去男女學生五十三人。其中，以清華十三男四女爲最多，北大七男二女，燕京三男四女，餘爲其他學校學生。蔣夢麟不滿學生行爲，立即開除爲首之四人。清華學生會要求校方營救，潘光旦教務長以事先不知情，須待調查清楚背景後再行保釋。[143]

因抬棺遊行被捕之十七位清華學生，4月13日釋放十一人，六人仍還在押。[144] 4月29日釋放女生徐驕寶一人，其餘五人和張申府夫婦尚在獄中。[145] 警

---

[142] 郭清是北平高中二年級學生，十八歲，因參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運動，又反對校長焦實齋，被軍警逮捕入獄，受刑致病，送醫不治死亡。北平學聯會就利用他作爲反政府的宣傳。見晨風，〈郭清的死〉，《一二九運動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530-535。

[143] 〈北平學生抬棺遊行〉，《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4月1日，9日，12日，14日。

[144] 十三日獲釋之十一人是男生任澤雨（1936級地學系）、裴昆山（未畢業）、趙德尊（1937級外文系）、傅國亮（未畢業）、王瑤（1935級中文研究所）、王新民（未畢業）、張卓華（1937級外文系）、張師載（1942級電機系）、蔡承祖（未畢業）九人，和女生張厚英（1943級機械系）、何玉珍（未畢業）二人。在押者爲男生李鼎聲（未畢業）、梁德輿（1937級哲學系）、朱和周（1940級地學系）、鄧維熙（未畢業），和女生徐驕寶（1938級物理系）、趙芳英（未畢業）六人。見〈抬棺被捕已釋二十五名，未釋者尚有二十八人〉，《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4月15日。

方懷疑張申府夫婦是共產黨（其實不錯），要送南京審判，後以其知所悔悟才釋放。至此所有自一二九運動以來的被捕之師生，因無人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全都在五月以前獲釋。[146]

學生抬棺遊行之目的，在製造政府迫害愛國運動的惡劣形象，以爭取社會同情。但因其行動過於激烈，為政府和學校製造極大困擾，社會亦不同情。及劉少奇參加決定「抗日統一戰線」的瓦窯堡會議後，於 1936 年春出主天津北方局，才糾正偏激的學生運動。劉向學生指出，日本是主要敵人，國民黨是次要敵人，過去學運以打倒國民黨為目標是錯誤的。一二九遊行時反對宋哲元和二十九路軍，以及無端抬棺遊行，都是錯誤的。因它徒令積極分子被捕，喪失社會同情，使黨陷於孤立。劉於是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要學生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改以李葆華為北平市委書記。李葆華依據劉少奇的指示，也批判從一二九愛國運動至三三一抬棺遊行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要求學生恢復上課，「一面讀書，一面救國」，尊重教師，團結家長。同時指示「學聯會」、各校學生會和「救國會」，必須在統一戰線政策下，向國民黨、文教界及黨政上層統戰，用和平方式團結學生，加強師生合作。[147] 換言之，劉少奇認為蔣南翔「華北之大已容納不下一張書桌」的口號，是錯誤的。呼籲學生應回到學校去一面讀書，一面救國了，不可動輒罷課。但是我們看 1936 年 4 月以後的學生運動，仍舊不尊重師長，蠻橫冒進，仍有不斷停課和罷課的行為。

## （二）反對日本增兵和二十九軍南調罷課遊行

先是，清華「救國會」，為響應第三國際「世界學生聯合會」援助中國反日運動，發表宣言，決定以 1936 年 4 月 22 日到 29 日為「反戰運動周」，全體罷課。呼籲大家「在統一目標下，結成堅固一致的統一戰線」，為祖國

[145] 〈北平被傳學生近又續釋數人〉，《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4 月 30 日。

[146] 《一二九運動史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 年），頁 114。

[147] 《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109-118。時北方局領導有彭真、林楓、徐冰及北平市委李葆華、黃敬等人。劉除升李葆華為書記外，提拔清華之黃誠為北京市委，領導民先隊，籌建全國學聯和全國救國會工作，1936 年冬黃升任市委書記，改由黃敬領導。姚依林也於七七事變後任天津市委書記。

生存，世界和平而鬥爭。[148] 日本的增兵計劃，正好爲清華學生「救國會」推動下一波運動的藉口。

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增兵計劃，醞釀多年，1936年5月1日，日本參謀本部經日皇批准，正式宣佈以第一師團長田代皖一郎中將爲駐屯軍司令官，增兵華北，脅迫宋哲元和二十九軍脫離南京政府統治，聽從日本擺佈，如宋不從，則將之驅逐。[149] 日本這一行動，給宋哲元遭受重大壓力。5月5日中共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150] 北方局立即宣傳，故社會上有宋哲元經不起日方壓力，將二十九軍南調的傳言。

5月29日，天津中等以上學生抗議日本增兵示威遊行。此夜，宋召集二十九軍將領會商，一致主張對日強硬，苦撐危局。30日宋公開發表談話：

> 華北外交時刻所爭者，爲保全我國主權問題。凡不損我國主權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則向前做去。余對交涉事，非所經手者，不願過問，個人所能負責所應負責者，絕對負責。[151]

由於宋氏處境困難，談話語氣不夠堅定，令人憂慮，連胡適都要求宋哲元表明立場，[152] 就怪不得學生憂心忡忡了。5月31日，北平各大學分別舉行會議，響應天津學生行動，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也在清華大學召開代表大會，有四十餘校七十餘位代表出席，決定：一、通電全國，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及二十九軍南調。二、推定各校代表分別聯絡各界一致行動。三、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153] 爲了方便宣傳和遊行，必須停課。清華和燕京二校學生會，未經校方同意，擅自決定自5月30日起停課五日，北大等校亦隨著跟進。清華之「救國會」且組織糾察隊，「對校內外人員出入，實行嚴密檢查，

---

148 〈清華大學學生救國會爲響應世界學聯會援助中國反日運動宣言〉，1936年4月29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2（下），頁919-920。

149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145-146。

150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冊1，頁8-9。該電文以「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因內戰之故，一國二府存在多時，中共且自視爲正牌的中央政府。

151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147。

152 同上，頁148。

153 《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5月31日。

規定每晚七時半至十時舉行時勢討論。」其他各校也都有宣傳、聯絡、座談、學術演講等活動。[154]

6 月 2 日，清華等二十九校學生代表百餘人，以學聯名義，帶請願書到南苑、西苑和北苑向二十九軍將士請願，獲得滿意的答覆。然後召開記者會，報告經過，爭取各界的支持。[155] 3 日，學生「救國聯合會」在清華同方部召集全市代表大會，有五十餘校代表八十人出席。先由聯合會主席報告開會意義：一、擴大組織（由三十八校增爲五十八校），加強實力。二、發表反對日本增兵宣言。三、各校自明(4)日起一律復課。[156] 但「救國聯合會」擴大改組後，突然決定於 6 月 13 日舉行抗議日本增兵大遊行，引起另一波動蕩和不安。

爲了 13 日的遊行，清華學生先遣隊五十人， 12 日先行進城，住進東北大學宿舍。 13 日上午，由於城外清華等校學生近千人未能進城，城內各校學生分南北東三路，向天安門集合，開市民大會，然後再向各地出發遊行。北路由清華大學五十人領軍，一路經各學校門口，壯大隊伍，至二千餘人。南路有師大等校千人。東路也有匯文學院等校千餘人。但三路隊伍在各路口都被軍警攔阻，發生小衝突，有二十八人被捕。由於遊行隊伍中多爲女生，缺乏鬥志，經數度衝散後，最後到達北平大學文理學院者，僅剩下三百人（其中清華四人）。除了發表「擁護西南出師抗日」和「要求政府立即出師抗日」等口號外，並沒有什麼具體收穫。被捕之二十八人，經北大等校校長請求秦德純市長和平處理後，亦於當晚獲得釋放。秦以學生行爲「極端不妥」，疑有不良分子操縱，擬按照行政院令頒佈戒嚴，以維持治安。[157] 其實，秦的質疑是正確的，因爲學生遊行的口號和中共中央的「抗日統一戰線」及「逼蔣抗日」的策略相呼應。 但清華「救國會」爲了「逼蔣抗日」，有時動作過火，下面的阻撓期考和決定無限期停課，便是一例。

---

[154]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6 月 1-2 日。

[155] 〈北平各校學生代表向二十九軍請願〉，《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6 月 3 日。

[156] 〈平市各學校定今日復課〉，《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6 月 4 日。

[157] 〈平學生遊行〉，《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6 月 14 日。勛毓，〈六一三關於清華特遣隊的報告〉，《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20-922 。

## （三）清華救國會阻撓期考被懲

6月中旬爲各校舉行畢業考和期末考之期，但學生於13日遊行後並未復課，使各校均陷於半休止狀態。北大、清華、燕京、師大、平大五校長於是集會，商議勸導學生復課辦法。北大蔣夢麟聲稱，未考者決不補考，缺考者留級一年。如有糾察隊，就開除，停辦北大也在所不惜，所以北大的考試如期舉行。其他學校亦多順利舉行，僅清華、燕京、東北大學和女子文理學院發生問題。

清華原定自18日起舉行期考一周，但「學生會」爲要求綏靖公署收回日前公佈之「緊急時期維持治安辦法」，17日晚上竟擅自決定「無限期停課」。18日當天，「救國會」的糾察隊阻止同學進入教室，擾亂試場秩序，並對主考教師無禮，使考試無法進行。此外，還拿走學校的報時鐘錘，擾亂校園活動秩序。梅校長立即貼出佈告，要查明嚴辦。由於考試已無法進行，乃決定除四年級畢業考仍應在本學期內舉行外，其餘學生提前於18日起放假，9月一日開學前補考，凡缺考者以退學論。[158] 梅校長18日的佈告說：

> 據教務處報告，本日學年考試舉行時，有學生在各教室門口阻止同學入內考試，並闖入考場擾亂秩序，對於主考教師亦有失禮舉動。又據庶務科報告，今晨有學生多人，強將打鐘錘取去，以致校內時刻無法報告。似此行動越規，實屬有干校紀。除俟查明嚴加懲處外，查本日情形，本學年學年考試已屬無法舉行，應自本日起即放暑假。所有學年考試，定於九月一日起舉行，屆時如有不參加考試者，即作爲退學。至四年級學生畢業考試，著教務處另定日期，仍於本學期內舉行。此布。
>
> 校長　梅貽琦
>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八日[159]

19日梅校長又貼出通告重申：「查四年級畢業考試，已定於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舉行，屆時如有不到場應試者，即以不及格論，如有學生對於

[158] 〈平市各校停課中之考試問題〉，《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6月17日、19日、20日。無長期停課的目的在要求當局收回維持治安戒嚴令。

[159] 《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2（下），頁922-923。

應試學生阻撓干涉者，即予開除學籍，應試學生如受阻撓干涉，准隨時指名到教務處報告，以憑懲辦。」[160] 學生雖然反對提前放假，但畢業考還是如期舉行了。

至於 18 日阻撓考試事件，經調查後，確定爲學生「救國會」所爲。校方決定開除其領導人黃誠、陳元、劉毓珩、吳承明四人。記二次大過者有救國會委員華道一（未畢業）、寧士英（未畢業）等十一人，和糾察隊胡光世（1937 級化學系）、鍾烈錞（1940 級經濟系）二人。[161]

「救國會」對校方的處罰，表示十分不滿。他們說「救國會」僅執行全體學生的決議，並沒有過錯。清華原本爲學術自由之地，老師都愛護學生。校方今竟如此懲處，不僅愧對學生，也喪失自由之美名。更甚者，學生因愛國行動而遭如此之「壓迫和摧殘」，表示學校已無正義和法律，也「無所謂辦教育」可言！對於這樣的學校，記過和開除又「算了什麼的！」[162]

被開除的黃誠更不服氣，狠批清華，說二十五年來清華從未壓迫過學生運動，「更不曾有過開除同學的紀錄，而今因愛國而被開除」。今既被開除，不留戀，也不後悔，仍爲救亡奮鬥。他指責政府和學校妨害救亡工作，無異「漢奸行爲」。[163] 黃誠指控政府與學校爲漢奸，乃自大狂的證明。說清華未曾開除過學生，則是掩耳盜鈴。別人不說，黃誠和他的同黨，不是也因阻撓教授會議被各記大過二次嗎？可見他毫無悔意。

## （四）地下黨重組與援綏活動

暑假期間，部份留校學生在「學聯會」指導之下，續有活動。方式爲上街募款、夏令營演習，和赴滬向國民黨二中全會請願。冀察政務委員會據報，學生利用暑假集會結社，爲防範未然，通令平津省市政府檢查新聞，嚴密防

---

[160] 〈清華後日起考畢業〉，《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6 月 20 日。

[161] 〈清華救國委員會敬告全體同學書〉，1936 年 6 月 30 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23-927。

[162] 同上。

[163] 黃誠，〈讓我們做最末一次被開除的學生吧〉，1936 年 8 月 10 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27-928。

範，並令各校教員填寫非共志願書。[164] 暫不論此舉是否正當，在政府嚴密監控下，共產黨人爲求生存發展，得重新調整組織。9 月開學後，北方局派彭真到清華大學工作。彭和新黨員楊述一（未畢業）等人，同住在一間學生宿舍裡十多天之久。在這期間，彭約見了蔣南翔、徐芸書（即徐高阮）[165] 等學生幹部，了解情況，當然亦有所指示。10 月北方局就在北平「學聯會」之上，設立「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簡稱學委），受北方局和北平市委雙重領導。學委以蔣南翔爲書記，委員有清華之高承志、楊學誠，及于啓明、王德、張敬齋等人，各有專責。蔣南翔領導學聯黨團和清華燕京的黨支部。彭真於 1937 年四月赴延安以前，每兩週來參加一次學委會議。此後，北平學生運動就由學委根據黨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行事。[166]

蔣南翔接任後的工作重點之一，應該是援綏工作。[167] 因爲這種活動政府不會禁止。但是學生整日停課在校內外募款、縫衣、到前線慰勞服務，並派人赴上海、南京、廣州、西安等地連絡，的確是耗費時間，影響課業。如清華數百位同學和十餘位教授夫婦，就罷課三日，在大餐廳製成棉背心五百件，送到前方去。[168] 梅校長覺得不妥，在 11 月 23 日的紀念週上，對全體學生說援綏可以，但非必罷課不可。梅說：

> 此時救國工作自不容緩，但非必罷課而後始能進行。罷課適足散漫人心，予社會以不良印象，而自己損失亦大。……如有一部同學因工作而缺課，學校方面或予便利，不必使大家一致不上課。[169]

梅說完話仍不放心，26 日邀蔣夢麟、李蒸、徐誦明、陸志韋和周鯨文六

---

164 〈冀察政會申禁集會結社〉，《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7 月 20 日。

165 徐芸書即徐高阮，徐氏此時已是共產黨員，未畢業即離開清華，後改名徐高阮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來台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何時投向國民黨，未詳。

166 《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169-171。

167 時日軍和僞蒙軍聯合向長城以南進逼，於喜峰口和懷柔被第三十五軍阻擊，受到全國各界（包括中共）之聲援和鼓勵，北平學生僅爲其中之一。傅作義(1895-1974)時爲軍長兼綏遠省長。按傅原爲閻錫山舊部，中原大戰後受張學良節制，任三十五軍軍長，駐綏遠，旋隨張歸順中央。在內戰時期，守衛北平，爲保護北平古都文物，向共軍投降。王世義編，《傅作義傳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 年），頁 1-34。

168 〈援綏——清大師生製棉衣〉，《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1 月 22 日。

169 〈清華學生組戰區服務團〉，《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1 月 24 日。

位校長到清華集會，商討由校方主導成立救護隊的辦法。他們決定：一、去電綏遠軍方，詢知前方實際所需，再決定援助物品數量和醫療隊規模。二、援綏工作以透過上海紅十字會辦理爲宜，避免學生直接介入。會後，北大蔣校長也貼出佈告，勸學生不可藉口援綏罷課，應以沈毅之氣作前方將士後援，北大的佈告說：

> 本月二十五日，本市學生藉口綏東情勢緊張，政府依然態度不明，無抗戰決心，宣言罷課。本校學生不察真象，冒然響應。查中央決心援綏，事實俱在，連日報紙所載，可資印證，中央軍隊並已進至綏遠，及其他軍事重要地帶。在此前方軍事異常緊張之際，後方秩序最關重要，吾人不應先自紛擾，……望本校全體學生體察事實，嚴守秩序，安心上課，以沈毅之氣爲前方將士之後援。……[170]

可是上海紅十字會沒有回電，綏遠軍方表示只需藥品及防凍衣物，不需學生服務。但學生志於前往，清華等校只好配合，組織戰區服務團，訓練護理，並分途募捐到約一萬五千餘元，或購買藥品，或製造防毒、防凍藥膏、皮手套、口罩、風鏡和耳套等物。時北方冰天雪地，志願組團到前線者不過四十六人，其中清華十九人（女生四人），東北大學二人、燕京十人、北大八人（其中有化學系主任曾昭掄和孫成諤教授）、協和醫院三人及西安學生代表六人。他們多在 11 月 29 日出發，預定在戰區服務二至四週。[171]

前往戰區的學生，顯然都與中共領導人一樣歡迎抗日戰爭的到來。清華學生戰區服務團出發前，在大禮堂的歡送會上慷慨宣誓道：

> 我們認爲綏遠的抗戰，是全國對敵作戰的序幕，是中華民族解放的先聲。我們願意自動出發前線服務，獻身給這個神聖光榮的事業，任何犧牲在所不惜。[172]

而西安代表計劃於晉見宋哲元和傅作義時，除表示「東北軍和西北人民」

---

170 〈平各大學當局商組救護隊〉，《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1 月 27 日。

171 《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1 月 27 日及 30 日。各校捐款數如下：清華 500 元，燕京 2,000 元，北大教職員 1,356 元，師大 600 元，協和醫院與平大醫院 4,000 元，西安各校 6,000 元，大公報社代收 624 元，共 15,080 元。

172 〈清華燕京戰區服務團〉，《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1 月 30 日。

對他們的欽佩外，還希望知道他們「對時局的主張」，並要求他們抗戰和收復察北。[173] 顯然也代表了張學良的心聲。

總之， 11 月以後的學生活動，以援綏爲重心，政府、學校當局甚至綏遠軍方都恐影響學生課業，但北平學聯欲鼓舞士氣，挑起戰爭。果然十二日後就發生了震撼世界的西安事變。北平學聯和清華「救國會」的政治立場於是受到嚴重的挑戰。

## （五）西安事變與清華「救國會」之被抄

西安事變的主角是張學良和楊虎城，但幕後煽動其逼蔣抗日者乃中國共產黨。前面說到國共之間是敵我矛盾，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是要消滅這個矛盾。但中共爲了本身生存發展，提出中國和日本是主要矛盾，國共之間是次要矛盾，所以主張統一抗日，逼蔣介石將槍口轉向日本。爲了達到此一目標，他們除了支持學生運動外，還直接向張、楊及其部屬進行遊說。最後二者會合，造成西安兵諫。關於中共和張、楊接觸的過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已有翔實的陳述和精闢的分析。[174] 以下就談談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的關係、事變後清華學生「救國會」被抄，與共黨組織和幹部從平津撤退的情形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張學良被日本趕出東北，痛恨日本，所以對一二九學生抗日請願運動，非常支持。證據有四：一、張爲東北大學校長，而東北大學遷北平之學生數百人，反日情緒高漲，宋黎等人均爲一二九運動的積極份子，張學良和楊虎城除了電報慰勉外，還召見宋黎。二、張學良除捐助清華民族先鋒隊四百元外，還派遣代表攜款六千元赴北平參加援助綏遠五十九軍抗日活動。[175] 三、西安各報之所以都支持學生運動，主要是獲得張、楊的同情和鼓勵。[176] 四、

[173] 〈清華燕京戰區服務團〉，《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1 月 30 日。

[174]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北一出版社，民國 69 年），頁 670-679 。

[175] 何炳棣於 1936 年 12 月 25 日晚上搜查清華救國會時，查到張、楊捐助清華民族先鋒隊四百元的收據。何雖敬愛張學良，但仍肯定張、楊支持一二九運動。蘇雲峰，〈何炳棣院士關於西安事變後「搗毀」清華救國會事件的回憶〉， 1998 年 6 月 16 日訪問記錄。

[176] Stephen Robert MacKinn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Vol. 23, No.1 (January 1997), p. 7.

事變前中共於是透過北平地下黨，安排宋黎到西安，向張、楊報告一二九及一二一六運動經過。張聽後深受感動。楊虎城更是興奮，高呼「抗日學生運動萬歲！」張且留宋爲秘書，並授與其他要職。稍後，張、楊又接見北平學聯會和民先隊負責人黃誠等人，聽取他們的報告，並請他們到西安各學校去向學生報告，掀起西安學生的抗日高潮。還支持西安學生舉行一二九週年紀念遊行請願。張學良在紀念會上「保證一星期內必有事實答覆」。[177] 遊行學生與軍警衝突，有小學生一名死亡。於是群情激憤，轉到清華池向蔣委員長示威請願。[178] 三日後發生「兵諫」。由此可見，一二九請願運動與西安事變有一定的關係。

西安事變震驚全國，一致要求懲罰。[179] 北平各大學校長和教授紛紛集會，謀求挽救辦法。會後分別電勸張學良「懸崖勒馬」，恢復「蔣委員長自由」；並請政府速決大計。清華大學教授會於 12 月 16 日發表宣言，指張學良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罪惡昭著，應受嚴厲譴責，請政府迅予討伐。此一宣言，不僅代表清華教授和大多數學生的心聲，亦和全國各界之主張一致。宣言說：

>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爲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爲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爲現在對外之鬥爭，須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能奏功。 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爲敵人所竊笑。
>
> 近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復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

17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673。

178 《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203-204。

179 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新店：國史館，民國 82 年），頁 271-326，爲各機關社團包括各大學之函電。惟所錄〈清華大學教授會請明令討伐電〉，甚爲簡短。本文所引用者較爲完整。

夫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180]

在全國震怒的情況下，各校「學生會」和「救國會」遂成眾矢之的。彭真代表中共北方局到北平，與北平市委黃敬等討論對策。彭主耐心等待中央指示。 12 月 14 日，北方局劉少奇可能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停止「救國會」等活動，以免與南京對立。故此後的學運目標，由反蔣改變為「逼蔣抗日」和「援助綏遠」。[181] 清大的民族先鋒隊， 18 日一反過去「愛國有理」的態度，以低姿態發表〈敬告全體同學書〉，承認「此次西安事變無疑地是一個越軌行動」，但張學良所提「立即對日宣戰」、「釋放救亡領袖，開放民眾運動」、「聯合各黨派共同抗戰」等八項要求，和一二九運動以來所提出的口號「大體相合」。口頭上宣誓擁護中央政府，希望此事和平解決，也希望清華同學內部不要自己對立起來。[182] 但右派學生群情激奮，「搗毀」救國會。

關於「搗毀」救國會事件，左派學生指控是何炳棣和劉安義「聚眾三十餘人」幹的。而何炳棣則強調僅他和陳國慶兩人，到學生會所去搜查資料後

---

180 〈平各大學當局昨午二次集會，決分電勸告張學良〉，《天津大公報》，民國 25 年 12 月 17 日。此次集會在北平清華同學會舉行，出席者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課業長樊際昌、秘書長鄭天挺、化學系主任曾昭掄。清華校長梅貽琦、教務長潘光旦。平大校長徐誦明、師大校長李蒸、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藝文中學校校長查良釗等十餘人。決由各校分別電告張學良懸崖勒馬，並請政府速決大計，以濟危局。 接著，輔仁大學、朝陽、中國、民國三學院及北平教育會，亦都發表通電給張學良。以清華教授會的電文最長，亦最為動聽。

181 《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205-506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頁 148-149 。按黃敬原名俞啓威，為俞大維之侄子，原讀青島大學， 1932 年因鬧學潮被捕，得俞大維之助，翌年保釋，考上北大數學系。姚依林，〈一二九運動回憶〉，《戰鬥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列》（北京：清華大學校史編研組， 1985 年），頁 98 。清華大學 1940 級機械系，亦有一同姓同名之黃敬。

182 〈民族先鋒隊清華分隊敬告全體同學書〉， 1936 年 12 月 18 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2（下），頁 975-977 。

即離去，後來左右兩派的衝突他完全不知情。

此事件的原委，據何炳棣回憶說，當西安事變和平結束，蔣介石出來的那個聖旦夜快十點鐘了，他從圖書館裡出來，碰上陳國慶（南開中學和清華皆同班好友）。陳說：「老何！老何！你知道委員長已經脫險出來了，他們（指左派）在開會，像喪家之犬！」「他們喊口號，喊中華民族萬歲，不喊中華民國萬歲，連國家觀念都沒有，豈有此理！」何未經思索馬上就說：「國慶，他們不是已成喪家之犬了嗎？我們現在到一院去」（一院是清華學堂第一大建築物，學生自治會和救國會就在那裡）。為什麼要去呢？何說是因西安事變期間，在閱報室裡天天有反政府的宣傳，看了很彆扭。這些小冊子都是左派學生印製的，大約有普通報紙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大小。何想利用左派低潮時候，到其所控制的學生自治會辦公室裡面，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到了那裡只見黃紹湘（ 1937 級歷史系女生）一人守著。黃後頭的書架上所放置的就是在閱覽室的那些報紙，一札二札的很多份。出乎意料之外，何在架子上頭很明顯的地方，發現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已經收到張學良、楊虎城四佰元的津貼的收據。何雖然尊敬張學良，但一時也火上心頭，拿走這個收據，然後和陳國慶二人離開現場。何強迫工友打開左派學生何鳳元的房間，一無所獲。何並非國民黨員，由於祈求安定讀書，與國民黨「同方部派」有默契，惟強調是臨時起意的一種衝動，並沒有率眾之事。不過，可能是「同方部派」護校團成員劉安義（ 1939 級）聞訊，率領三十餘人過去，並在學生會所檢得《曉報》、〈人民革命同盟會告民眾書〉、〈英文稿西安事變經過〉、〈東北救國會西安報告書〉等文件。

根據何氏的回憶，那天晚上大家都沒有法子睡覺，因各方面都很激昂，幾乎上千人會集在田徑場和足球場裡，亂烘烘的，何當時也在那兒。有個叫王天眷（ 1938 級物理系）的，搥著手走過來，對何說「嘿！你好漢，你好漢嘛，做強盜？」突然間給何一拳。何也很厲害的回他一拳後，跑到北院劉崇鋐老師家裡躲起來。學生會所那邊左右兩派發生肢體衝突的時候，何已經不知道了。何後來將張學良贊助民族先鋒隊的四百元收據，交給梅校長，請其

焚毀以免張學良受害，同時請求校長解散所有政治組織，讓大家安心讀書。[183]

「救國會」認爲何炳棣等人之行爲，已破壞自一二九以來的「救亡運動」成果，和清華的「自由空氣」，請教務長潘光旦了解實情，依法處置。由於學校長期以來對「學生會」和「救國會」十分頭痛，潘光旦查驗後，就召開教務會議，決議「停止學生會活動」，並於28日宣佈解散「救國會」等團體，其成員十八人各記大過一次。[184] 至何炳棣，一因他衝入救國會搜尋文件，二因他逼迫工友打開同學的房間，被記大過二次。外文系教授吳宓和經濟系教授趙人俊去函安慰何之父親，謂何是一位既愛國又用功的好學生，應爲他的行爲感到驕傲。[185] 大部分學生對學校之處置左派學生，未表示意見。但左派「學生會」當晚召集全體大會，企圖翻案，惟因出席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29日（星期二）有學生三百餘人請求同學於紀念週前開會，也因時間匆促未果，翻案失敗。在紀念週上，學生聆聽梅校長訓誡後，多數信服，僅少數被毆學生不服，要進行起訴。[186]

北平各校都發生同樣的情形，因各校同學對27日「救國聯合會」所主辦的「天安門慶祝遊行」，普遍表示不滿，紛紛要求當局解散重組「學生會」、「學聯會」、「救國聯合會」等組織。翌日就在師大正式成立「新學聯」，招待記者。同一天，北大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也討論學生會問題。決議：一、「學生會」近日所爲，未能符合同學公意，應即止活動，聽候定期改選。

---

183 蘇雲峰，〈何炳棣院士關於西安事變後「搗毀」清華救國會事件的回憶〉，1998年6月16日訪問稿。

184 上述經過除何炳棣之回憶外，據〈救國會通知〉、〈關於救國會被劫存件敬告教授及全體同學書〉，及時在現場之〈救國會委員黃紹湘述二十五日學生會被搗毀的經過〉，《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2（下），頁977-979，時在場之「救國會」委員有王達仁（1937級經濟系）、黃紹湘（女，1937級歷史系）、宋英（1936級政治系）、唐寶鑫（1936級經濟系）四人。而前往質問和搜查文件者除何炳棣外，尙有蔣憲端（女，1937級地學系）、林傳鼎（1938級心理系）、劉安義（1939級中文系）、陳國慶（1939級經濟系）、秦寶雄（未畢業）、莫德全（1939級政治系）、王晹（1940級政治系）等三十餘人，其中，以王晹態度最兇，要動手打人。但何炳棣強調只有他和陳國慶二人，其餘都是後來去的。

185 〈何炳棣院士關於西安事變「搗毀」清華救國會事件的回憶〉。

186 〈平各校學生不滿學生會，多停止活動〉，《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12月30日。

二、定3月1至8日爲北大學生自治會各班代表改選日期。[187]「新學聯」是否已成功地取代了舊學聯，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左派學生轉入地下，且產生分裂，這是自一二九運動以來，左派學生運動的低潮時期。讓北平甚至全國學界享受到一段平靜的日子。然而，七七事變突然爆發，舊學聯等左派組織又活躍起來。

## （六）從學聯慶祝七七事變看中共的戰爭責任

關於中日戰爭的責任問題，學者們所爭論的，不論是日本軍部、近衛文麿內閣或日本天皇，[188]都要負全部戰爭責任。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很少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也有一部份責任。如何說呢？有四事爲證。其一是在西安事變以前，中共發動學生運動，要求國民政府抗日。如果政府不採取妥協政策，則戰爭早已爆發。其二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因蔣委員長接受抗日要求，中共和左派學生組織都歡呼慶祝。其三是張學良隨蔣氏返回南京，使在西安的東北軍解體。同時中央軍進駐西安，延安共軍四面楚歌。爲避免國軍進剿，中共當然「希望抗日戰爭發生」。[189]其四是七七事變後，中共和左派學生組織所表現的歡天喜地之情。

七七事變後，「學聯會」、「救國會」、民先隊和延安的中共領袖一樣，非常高興，「大家激動地互相傳語，民族解放的號炮響了！」因爲他們已經逼出一個「聯合抗日的統一陣線」。毛澤東表示，「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已無力危害我們」共產黨了。[190]清華學生會代表趙儒淮（未畢業）等三人和東北旅京同鄉等團體，紛紛到保定去慰勞二十九軍官

[187] 〈平學生界組織新學聯〉，《天津大公報》，民國25年12月29日。北大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成員有周炳琳、吳俊升、湯用彤、陶希聖、梁實秋、張景鉞、樊際昌、姚從吾、饒毓泰、曾昭掄。樊際昌爲會議主席。

[188] 陳在俊，〈中日兩國全面戰爭的導火線：盧溝橋、廊坊、廣安門事件之探討〉，《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5年），下冊，頁545-569。陳鵬仁，〈近衛文麿與中日戰爭〉，《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等主辦，1995年9月）。

[18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676-679。

[190] 陳存恭，〈毛澤東抗日策略：由「不打硬戰」到「抗而不戰」〉，同前引書，頁100-102。

兵（師長馮治安、張自忠，團長吉星文）。[191] 由此可見，中共的學運政策目標在促成戰爭，以便保全自己。

現在，讓我們看看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的應變措施。日軍於 28 日，以陸空優勢，進攻南苑（時在此受訓之大學畢業生千餘人，亦參加戰鬥，傷亡不少），翌日佔領北平，北大學生已全部離校。[192] 30 日日軍進佔天津。國共兩黨都決定撤退。不過中共黨團組織輕車簡從，比較容易，而國民政府則是負荷沉重。宋哲元、秦德純等人於 28 日晚南下保定。二十九軍也同時離開北平。[193] 跟隨著的當然是一大批政府黨政機關，和各大學之人員設備和重要檔案。這是何等艱鉅繁忙的任務。

中共北方局呢？劉少奇和彭真等於事變後，即由北平移往山西太原。[194] 隨即決定撤出平津黨組織、黨員、幹部和積極分子，或到太原，或到鄉村打游擊。天津市委書記姚依林將黨員分批疏散赴上海。 28 日，中共北平市委開緊急會議，決定各校學生分頭離開北平。書記黃敬，市委李昌、黃誠、王文彬、安子文（ 1954 年任政務院文委），及學委和學聯黨團蔣南翔、楊學誠等，均從天津乘船到青島、濟南和煙台等地，然後轉赴武漢、太原或南方。最諷刺的是，蔣南翔、楊學誠和王文彬等人，且得到天津國民黨人原山東教育廳廳長何思源之助，以平津流亡同學名義，享受免費食住，平安到達濟南後轉太原。[195] 可見抗日之聲喊得最高的學運領袖們， 也是跑得最快，最安全的一夥。他們何曾考慮到其他老師同學和一般人民的安危？

---

191 《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241 ；《天津大公報》，民國 26 年 7 月 20 日。

192 鄭嗣仁，〈鄭天挺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5 ，期 3(1998)，頁 48 。

193 《秦德純回憶錄》，頁 175-182。二十九軍軍長為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下轄四個師。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駐北平、保定，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駐天津附近，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駐河北南部，一四三師師長劉汝明駐張家口附近。

194 《劉少奇同志生平活動年表》，頁 10 。

195 《一二九運動史要》，頁 242-246 。

# 結 論

清華是一所設備齊全，校園優美的大學，尤其是 1929 年改為國立以後，師資和課程都有巨大的改變，如果不發生七七事變，清華的工學院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對中國工業的現代化有明顯的助力。在這樣令人羨慕的讀書環境中，竟然是學生運動的源頭之地。使人不禁要問，清華學生運動，何以由五四時期的後知後覺，轉變成為 1929 年以後的先知先覺，且居於華北甚至全國學生運動的領導地位。

從清華內部原因分析，我的解釋是：舊制清華時代(1911-1929)之校園所以比較安定，有下列因素：一是由於清華學生受到預備留美的引誘所制約。二是美國駐華公使、外交部和學校師生都傾向「學術獨立」，努力避免政治介入校園。三是學生年齡平均較北京其他大學學生為低。四是校園環境優美、經費充實、教學設施齊備，教師認真教學輔導，學生忙於念書和參加多采多姿的課外活動。五是清華距離北京市區較遠，且交通不便。以上因素，使這一時期的清華學生比較專心念書。[196]

1931 年以後轉為活躍的內部原因有四：一為 1929 年改制為國立清華大學後，學生年齡較大。二為清華大學畢業生，不能再直接留美，必須在國內尋找工作，可是這時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很高，尤其是文法科系畢業者，在校生多有前途茫茫之感，故清華大學參與學生運動者，亦以文法學院學生居多。三是共產黨在北平的組織受到軍警的監控和鎮壓，不易展開活動，而清華地處郊區，又有學術自由傳統的保障，較易滲透和發展黨組織。四為日本加緊侵略中國，激起巨大的民族主義情緒，學生深受刺激，思想左傾。

《清華大學校史稿》編纂者說，1934 年 5 月清華公佈〈清寒助學金和清寒公費生辦法」後，「家庭生活比較貧寒的中產階級以下的子弟，大批的湧入清華」，才產生學生階級分化和革命化的。[197] 但根據這一年考入清華歷史系的何炳棣說，清寒學生能考入清華者極少。因清華規定，只給清寒獎學金

---

[196]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5 年），頁 243-318。

[197] 《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256。

二十名，每名每年二四〇元，但其考試成績必須在前面若干名以內者，方可錄取。換言之，報清寒獎金者必須考得極好，否則雖合乎一般入學分數標準，也不能錄取。由此可知清寒學子「大批湧入清華」，促成革命化之說，不能成立。相反的，何炳棣還列舉了多位出身富有之家的激進男女，證明革命與否，和家境貧富無必然的關係。

《清華大學校史稿》高度評價一二九運動，認為它培養了一批重要革命骨幹，對共黨作出重大貢獻。[198] 但是從本研究中，我們發現清華學生運動幹部群的四點現象。一是人數不多，以『救國會』成員為例，最多不過十餘人，全部不過數十人。二是他們投身政治運動，無心學業，中途輟學，或被開除，故未完成學業者甚眾。三是他們對共黨革命事業的確有貢獻，但多數命短，以清華大學校史室所編《清華英烈》三十九人，平均壽命僅三十點二歲，黃誠和楊學誠等屬之。四幸存而能享功名者極少，如蔣南翔、姚依林、冀朝鼎、吳承明等人而已。

政府和革命政黨組織之間，是一個敵我對抗性矛盾。政府為維持秩序，有監視、追蹤、阻止或制裁革命破壞活動的公權力。革命團體則利用大學學術自由的保護傘，滲透校園，利用學生的熱情掀起學潮，困擾政府和學校當局，以達到取得政權的目的。在取得政權過程中，革命黨絕對不擇手段，犧牲學生學業，也不會計較社會成本和人民利益，故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是龐大的。因此在取得政權以後，效法被它推翻的政權，禁止及鎮壓學生運動。這已是一個歷史模式。

中共地下黨份子操縱各大學「學生會」、北平「學生聯合會」、各校「救國會」、「救國聯合會」及「民先隊」等組織，以學校為保護傘，先是利用愛國口號，反對政府對日軟弱，爭取同學和社會支持。續則利用一些社會不公事件，遊行示威，爭取同情。一旦和憲警衝突、受傷或被捕，必要求學校當局交涉釋放，若政府處理不當，又成為另一波事件的導火線。這樣，惡性循環，使政府備受困擾，學校也因此而癱瘓。

國民政府的「安內攘外」及對日的妥協政策，有其一定的理由。在西安

[198] 如上，頁 281-283。

事變前，不因學生愛國運動而有所改變。相反的，日本以華北社會不安，使其政治經濟利益蒙受損失，係受共產黨操縱所致。於是有增兵華北，逼退二十九路軍，以鞏固其利益的行動。換言之，學潮所造成的政治社會動蕩，適足為日本加緊侵略中國的藉口，也正是中共逼蔣抗日的目的。換言之，蔣希望與日本暫時和平相處，以便消滅中共；相反的，中共則希望中日戰爭早日爆發，以保全自己。

一二九救國運動與西安事變也有關連。張學良和楊虎城對此一運動都曾表示同情，尤其是對參加運動的東北學生領袖異常關愛。因之，我們可以確定，西安學生在西安事變前三日舉行的一二九運動週年紀念示威遊行，是激發事變的導火線。

就事論事，政府雖然知道中共地下黨份子操縱學運，但共產黨人頭上並無標簽，所以公安部門偵訊時亦很難獲得明確的證據。而一般學生不明究竟，多同情被捕同學，厭惡政府及公安人員。學校當局雖知「學生會」和「救國會」等組織的真實背景，然居於愛護學生，不忍置之死地，致學生有所依仗，頻頻發生事故，使學校負責人剪不斷，理還亂，苦不堪言。

國民黨對學生愛國運動也處於三難境地。一、為青年有愛國熱忱感到欣慰，相信中國不會亡，但未能使他們安心讀書，備為國用。二、自知國力薄弱，非日本對手，必須隱忍妥協，爭取備戰時間。但妥協政策，又被學生視為投降。三、學生要求國共聯合抗日，原則不錯，實際上兩黨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短暫的合作並無實質上的意義。

國民政府處理學潮的態度，可以分成四個階段，北伐以前，國共兩黨都以在野之身從事學生運動，打倒北洋政府。北伐以後，國民黨當政，禁止學運。如蔣中正 1931 年以行政院長身分〈告誡全國學生書〉，已表示對各地學校學風之敗壞和學潮之蜂起，十分痛心，從而認定破壞法紀之學潮為反革命，要「嚴厲禁止，如法懲處」。事實上亦有因「搜出反動書籍」被勒令停辦的例子。[199] 不過，從長期的歷史觀點看，在 1945 年以前，國民黨的學運政策，

[199] 陳進金，《抗戰前教育政策之研究，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6 年），頁 126-127。

可以說是相當溫和的。我們從本文中，可以看到政府公安部門，對遊行示威學生，大多採取溝通、了解、防止、圍堵的辦法，在不得已情況下，才用水龍驅散。開槍射殺事件雖偶爾有之，傷亡並不嚴重。曾經被捕關在監獄中之學生，有受到上腳鐐、審問和刑求之事，但與後期比較，則不算嚴重。[200] 受審時，因無人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所以最後幾乎都獲得釋放。

抗日戰爭時期，大小學潮至少四十四起，不論是政治性的或者是非政治性的，政府的處理態度，大致仍舊是溫和的。[201] 直到 1945 年 12 月 1 日的昆明學潮，才採取鎮壓手段，以槍彈對付特定的教授和學生，造成八人死亡（其中有四名教授）和十餘人重傷慘案。[202] 抗戰勝利後之「反飢餓」、「反內戰」學潮，政府的態度更加嚴峻，手段亦比前嚴厲。遷台後痛定思痛，認爲大陸之失敗，根本原因在於學潮。總結經驗，乃採取更強的鎮壓政策。 1949 年發生於台北的四六事件，本係單純的取締兩人違規共乘單車事件，卻引發成逮捕師範學院學生數百人和台大學生二十一人的嚴重事件，上腳鐐、坐牢、寫自白書、疲勞審詢，甚至槍斃，倖存者也得受到嚴密的跟蹤和監控，就是這一白色恐怖政策的開始。[203] 可以說比大陸時期，尤其是比本研究的時期嚴酷百倍。可是若要和 1989 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相比，則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

200 魯特，〈獄中日記抄〉，《一二九運動資料》，頁 538-559。記一二九運動被關學生的獄中生活十四天的情形，有吃有睡，有外來援助和慰問，同儕間有說有笑，不像台灣四六事件被關者那麼痛苦。

201 劉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6 年 6 月），頁 179-193，「戰時大後方大學之學潮統計表」。

202 楊正凱，〈西南聯大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2 年 6 月），頁 157-171。

203 〈王家儉先生訪問紀錄〉，此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沈懷玉於民國 87 年 1 月所作的訪問紀錄。內容述及王教授於四六事件中，被捕審問及坐監一年十一個月的詳情。這是一篇客觀翔實的回憶。真正反映出當時政府所採用的嚴酷手段，和大陸時期有所差別。《台大四六事件考察——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總結報告》（台北：台大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民國 86 年 6 月 7 日）。也敘述此事件的前因後果。至於此事件的歷史評價問題，可以另從不同的觀點去作評論，不是本文所關心的。